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 年 06 月

细则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
轮值编辑：孙骁骥
观察员： 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葭（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 • 孟菲斯）

编者按：

6 月 11 日，南非世界杯开锣。相比于上海世博的“盛会”，足球竞技场或许更为纯粹和真实，恰如当我们面对当今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般纷乱的现状时，更愿意去书籍中寻找那个更纯粹的，属于每个人内心的中国。

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随着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因不堪重负而纵身一跃，洛克菲勒的名言越发成为中国的现实：美国红蔷薇之所以有艳丽的色泽和宜人的芬芳，只是因为牺牲了早期生长在它周围的许多花蕾。

“万众一心”的中国红蔷薇背后，有太多东西被人们廉价地忽略，比如工人的尊严和生命，比如卢安克的自由选择权。这位为了追求“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而志愿来到广西农村支教的德国人，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卑微与渺小。

卢安克翻译施泰纳所著的《儿童的教育与改革》一书中，有这样的话：“为了能弄清一个人的将来，我们需要研究他的掩藏的本质。可是我们现时代的人不愿意这样做，现代的人只管表面出现的问题，却没有耐心，也没有信心和把握去研究隐藏的问题。”

但愿，阅读能帮助你我找回面对这个国家的“耐心”和“信心”。

勘误：

2010 年 5 月号的《独立阅读》刊发扬克《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京都学派》一文后，身居日本的读者王前先生来信：

“扬克的文章极有见地，尤其联系国朝的情况写的地方，尤其精彩。不过请允许指出两个小小瑕疵：三木清这个曾经在海德格尔指导下学过哲学的大才子，不是战争结束前去世的，而是在战争结束不久后去世的：他死得很冤，战争结束后大概是大家都顾不上他了，他竟然继续被关押，于同年九月在狱中去世。另外一处是关于国朝某名学者引用京都学派观点的部分，据我管见，他引用的似乎是历史学的京都学派，而哲学的京都学派国内好像还没怎么介绍过。历史学的京都学派中的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国内都有些翻译可以找到。”

经作者再次核实，三木清的确死于战后；汪晖在某篇会谈纪要中对京都学派的引用，也仅限于东洋史学派。

两处错舛，盖作者当时之疏忽，在此一并订正。感谢这位读者和他的来信，有如此优秀的读者时刻关注、敦促我们，实乃“独立阅读”同仁之幸。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4**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苏小和） 4
ESSAY&FICTION 散文与小说（朱白） 8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朱航满） 9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罗四鸽） 11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成庆） 13
HISTORY&CULTURE 文史（王晓渔） 14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16**

HONGKONG 香港 **16**
也斯的香港（严飞） 16
INDIA 印度 **17**
谁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埋单？（孙晓骥） 17

BOOKREVIEW 书评 **19**

夭折的上帝与有待“救赎”的人心（成庆） 19
洞悉真相的围观群众（贾葭） 22

LIVESPOT 现场 **25**

合金般的德国之声——谈法兰克福广播乐团上海音乐会（成庆） 25

观察 OBSERVATION **26**

富士康与中国模式（夏佑至） 26

ART 艺术 **30**

英国的波普艺术（刘柠） 30
没有民间，只有“被民间”（王晓渔）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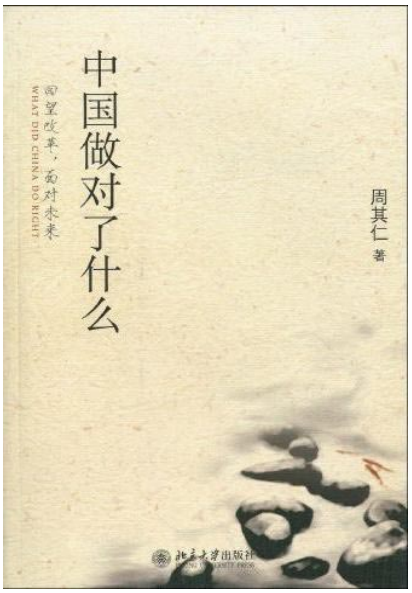
INTERVIEW 访谈 **35**

刘亮程：我们改变不了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灵子） 35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市场和信仰，可能是一个有远见的经济学家需要持守的两个思想维度。

关于市场，米塞斯的伟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聂薇 裴艳丽 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周其仁先生的**《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就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最有指导意义的风景。米塞斯的这本巨著，34年前，台湾的夏道平先生就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在台湾出版，而在1949年，中国所谓翻天覆地的年代里，米塞斯就将这部伟大的书稿交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可叹中国大陆直到今天才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一套简体版，可惜翻译不太尽如人意，比如一个经济学家叫唯瑟，结果在注释里，弄成了唯色，我还以为是诗人唯色。此前，作为一个经济学的爱好者，我曾经托人从台湾购买这本书，而此前的此前，我曾经从网上下载夏道平的繁体版，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页一页打印出来阅读，1000多页A4纸堆在我的书桌上，厚重复厚重。我觉得这一大叠厚厚的纸张，已经不是纸张，我的书桌上堆满了自由。而周其仁的新书，我知道曾经是他在科斯年会上的精彩发言，当时读来就拍案叫绝，30年改革历程，邓小平和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周其仁沿着市场经济的路径进行了让人信服的考证。

关于信仰，看起来似乎与经济关联不大，但熟悉市场经济历史演进的人们必然注意到一个现象，约翰·加尔文的著作《基督教教义》，以及由此展开的基督教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美妙的同时与同构的关系。最基本的历史现象时，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体系的建成，而市场经济自由企业的发展，背后由新教伦理支撑，这已经被马克斯·韦伯考证为一种了不起的发展范式。至于我提到的图图大主教，那个距离我们遥远的南非，我们都知道了不起的曼德拉，但曼德拉却说，如果没有图图大主教，他无法坚持他的事业，如果没有图图大主教的爱与宽容，南非的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几乎无从建立。

集中精力说米塞斯。

我试图用最日常的语言来描述米塞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曾经一个人寂寞奋战，为我们找到了自由。这样一名与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相关的经济学家，不应该让他仅仅成为书斋里的藏品，这个世界的每个局部，可能都有米塞斯的身影，他是市场的发现家，是自由的守望者，是一个能预知人类命运的先知。

先看看米塞斯珍珠一般的句子（以下均为台湾译本）：

欧文以为在私有财产废除之后，人就可以成为不朽；傅里叶更是胡说八道什么充溢着柠檬汁而非盐水的海洋；马克思的经济制度轻率地忽略了物质生产要素的稀缺事实；托洛茨基则宣称，在无产阶段的天国里，一般人的人格将会升华到亚里斯多德、歌德或者是马克思的水准，在这个水准之上，还会有新的高峰突起。

除了自由，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如果没有可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看得见的国。

经济学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你就不可能懂得经济思想史。

几乎每一句都是警世格言，让人坐立不安。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米塞斯这个陌生的名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并不显赫，一些时候甚至有点狼狈，他一直独立行走在经济学的路上。2000年，在去世多年之后，豪迈的《自由》杂志推举他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但即便如此，知道米塞斯的人们少之又少，大家只记得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哈耶克，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关门弟子，某种意义上，没有米塞斯，就没有哈耶克。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教授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哈耶克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两个人相视大笑。从这个时候开始，哈耶克便开始在米塞斯门下工作，米塞斯甚至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日后，哈耶克感激地说，如果没有米塞斯协助，他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呆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上。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哈耶克与米塞斯的交流、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米塞斯和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

历史不幸被米塞斯言中，他自己的命运也不得不被裹挟其中。

在米塞斯的诸多著作中，对哈耶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那本《社会主义》。这本书源自米塞斯1920年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之扩充，整合成一本全面批评计划经济的著作，等到开始系统写作鸿篇巨著《人的行为》，米塞斯意识到，这本《社会主义》仍然是必须收入其中的学术基础。

今天看来，米塞斯为人类社会呈现了一种清晰的真理，但在当时当地，却是被大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歪理邪说。米塞斯刚好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思潮和计划经济方法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一蔓延全球的集体性癫狂，始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当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银行体系崩溃，整个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失业率超过25%，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而美国总统胡佛的政府刺激政策，以及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更是强化了政府计划表面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美国、英国等老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疲于奔命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却在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1928年-1937年，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一片楚歌，但苏联人的计划经济却一路高歌。1929年，苏联人大规模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工业化，其增长速度是过去经济发展史上没有过的，人们似乎觉得一种新的，更加优越的发展模式正在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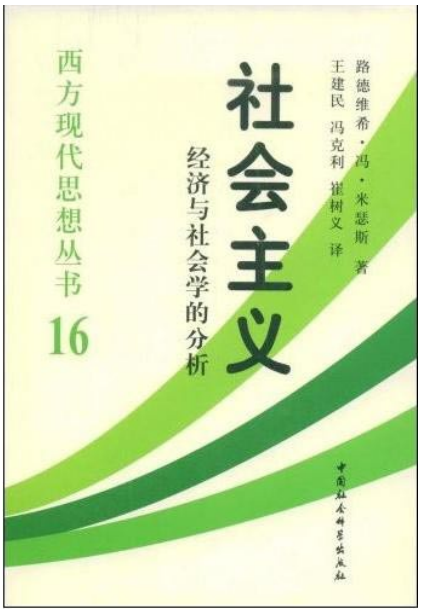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太多的人相信苏联人找到了真理，人们以为一个乌有的美好社会即将出现，连英国人罗素、法国人罗曼·罗兰、中国人胡适之也曾经短时期内认同这样的局面。

米塞斯至少提前半个世纪看到了这种宏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死期。“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不能被人们悦纳”，不能是奥地利，还是德国，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当局者似乎都对米塞斯的论述不屑一顾，直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一批愿意思考的人们才发现，凯恩斯的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其实漏洞百出。为了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方法，新奥地利学派开始从米塞斯那里重新挖掘真正的自由经济源泉，由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倡导的奥地利学派才开始迎来复兴。

可叹这个时候，伟大的米塞斯已经去世多年。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理，可是这个世界却亏待了他。

米塞斯是犹太人，他不仅生活在一战、二战这样暴力仇杀的时代，而且生活在一个邪恶的希特勒反犹主义时代。他一生颠沛流离，1934年，他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去到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任职，1940年，日内瓦同样遭到了希特勒的逼迫，纳粹疯狂地屠杀所有犹太人，米塞斯只好仓惶出走，迁移到美国纽约。可是在美国，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同样遭到了主流经济学

的排斥，没有一所一流的大学聘请他为正式教授，所以他只能在纽约大学挂了一个客座教授的名分。从194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米塞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领到过薪水。他的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只是靠美国的一些私人基金会支持。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米塞斯名声式微，生活拮据，但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批优秀的学者，大家凭浓厚的、共同的学术兴趣交流，分析，探讨，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米塞斯周围进进出出，围绕着哲学、行为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神学进行面红耳赤的辩论。而这些人当中，后来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泰斗，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哈耶克和罗斯巴德。1970年代，罗斯巴德回忆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时，将米塞斯称为“守望自由，传递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

表面看，米塞斯和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中国近100年的经济史变迁，却刚好佐证了米塞斯理论的正确。

按照杨小凯先生的经济史区间划分，一百多年以来，近现代中国经济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区间：第一区间是以洋务运动为主体的晚清经济改革。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中真正开始企业建设、企业家阶层开始诞生的时代，虽然它的企业形态主要由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来组成，但国家重商主义的战略思路，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民间商业力量，第一次象征性地走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第二个区间是民国时代的黄金十年，1928年到1938年。十年之内，国家经济出现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商业的自由竞争意识前所未有地彰显，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第三区间则是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接续晚清经济改进的传统，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将中国经济推到自由市场的门口。

阅读米塞斯，我们惊讶地发现，上个世纪初期，米塞斯就说，一种看上去持续不断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潮，实际上只能引起经济衰退，随后蔓延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完全验证了米塞斯的预言，而接下来胡佛总统的政府刺激经济策略，又继续用同样的错误，将美国大萧条延长了5年。面对汹涌的经济危机，米塞斯建议，政府必须停止货币扩张，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者投资，让经济运行自行出清，走回正轨。然而他的主张败给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没有受到重视，之后几十年，他的理论与主张都被主流经济学排斥，直到80年代全球计划经济国家分崩离析，人们才忽然意识到，伟大的米塞斯其实早就为我们找到了真理，只是我们鼠目寸光，总是追求短期利益，一次又一次与真理失之交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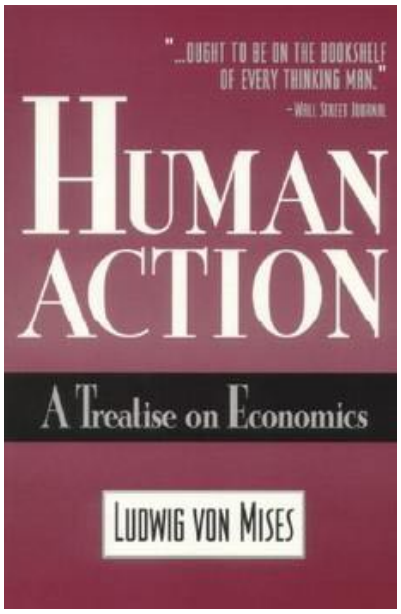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世外桃源，百年中国经济的命运，事实上也隐含在米塞斯的学术表述之中。可以这么认为，从晚清经济改进的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终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一直深深陷入到米塞斯反复批判的社会主义人造市场的迷狂之中，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迷茫一样，中国经济被看上去很美的计划经济耽误了百年。同样，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寿终正寝，自由市场选择终于成为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中国人邓小平基于一种发展的本能，用改革开放的口号，终于不算太迟地赶上了世界新一轮自由市场发展的大潮。也就是说，中国人耗费百年光阴，终于很不情愿地、欲抱琵琶半遮面地回到了米塞斯的经济学轨道上。

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人类经济学思想的极致。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梦寐以求，但却以为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

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

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米塞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将货币理论与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整合，这如同整合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构建了综合的经济学体系。所以张五常说，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差别，就是在于“宏观经济学多了一个货币”，微观经济学从未做到对货币进行分析，但伟大的米塞斯做到了。

货币价值边际效用，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聪明的米塞斯却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社会最为真实的经济史：我们今天需要货币，是因为它昨天的购买力，而昨天的购买力，又来自前天，这是一个时间隧道，因此一直可以回溯到人类货币的起点。这当然是一副遥远的经济学图景，以货易货的时代，人们的交易媒介不是货币，而是具有某种用途的替代物品。随着交易水平的提高，终于有一天，黄金或者是白银充当了这种交易媒介，因为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边际效用。

米塞斯的这一发现，启迪了人类社会重要的“自由货币制度”（free banking）。货币从一开始就来自自由市场，因此米塞斯极力反对政府任意印刷纸币增加货币供应。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中国经济的第二重错误，就是不断用政府力量上演所谓宏观调控，这其实是借宏观经济学之名，人为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牺牲民众福利，获取利益再分配的好处。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天量货币刺激政策，事实上首先破坏的，是货币自由市场。这种人为设计的货币供应量，只能扭曲市场价值信息，扭曲生产结构，促进更加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

第三重错误，应该是中国经济一直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商业周期。

米塞斯认为，由于人性绝对的趋利特征，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事实上是自由市场的一种自我修正。“如果我们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称作经济进步的话，我们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叫做退步，把萧条叫做进步。市面兴旺是经由错误投资而浪费稀少的生产要素，同时也经由过度消费减少了物资的存量，他的所谓利益是以穷困做代价的。相反的，萧条是走回头路，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在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准确地说，不仅中国政府对商业周期无法理解，中国的企业也完全是瞎子摸象。有一种现象这些年一直经久不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的就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无序。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类似于中国成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境界，需要人们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视野，如果政府面对繁荣就忘乎所以，面对萧条则惊慌失措，我们的企业也会六神无主，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而只会产生一批跟着政府瞎撞的生意人。

米塞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对“人造市场”，而中国经济近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人造市场的历史。这既是一种经济习惯，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总以为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政府不仅制造每个人的生活，还自以为是掌管每个人的生意。计划经济、公有制，成为政府挥之不去的乌有之梦。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忽略甚至取消市场价格机制，天真地认为市场层面的成本、交易费用、边际效用等自由秩序，可以由长官意志替代。这是第四重错误：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这直接导致，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永远在黑暗里摸索。只有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这种名义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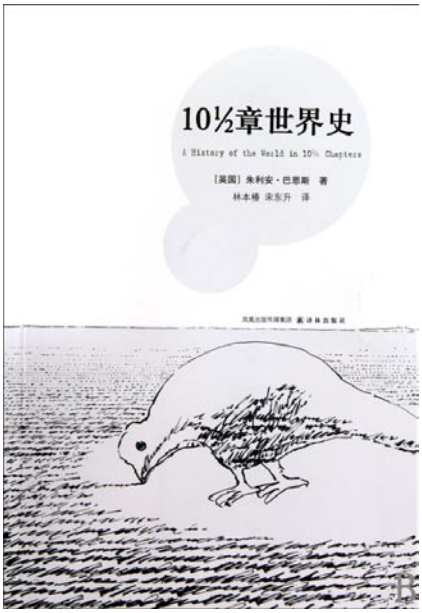
米塞斯最后一个伟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进程下，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凸显出来。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前所未有的肯定企业家的市场创造性价值，在他的眼里，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米塞斯甚至注意到，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这样的分析简直是为古老的官僚中国量身定做。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百年

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他们胸无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演进的主旋律，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由此，中国经济的第五重错误，是政府的过度膨胀干扰分工，缩小市场，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的自由生长。

图2为米塞斯

ESSAY&FICTION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 （广州，zhubai@tom.com）



最近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它将近几个月以来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辞职联系起来，串成一个时间表，来说明电影《2012》里演的状况快成真了。“谣言”为的是好笑，可这笑声背后又有多少人敢笃定这一切真的仅仅是好笑呢？反正我嘿嘿笑过片刻后，是真的会想想这两年我要怎么度过。比如，上船就不太可能了，那都是留给人类精英中的精英，或者生存下来会对以后人类有所贡献的人留着的，像我这种稍微比精英好一点的人，就甭想着活着跳上方舟了，所以消耗是一个办法，消耗这两年，消耗自己的身体，消耗能消耗的一切。但，魄力是个问题，我只听说一个女性朋友真的辞职、卖房以便轻松迎接，自己从来没敢动过这个念头。**《101/2 章世界史》（巴恩斯著，林本椿、宋东升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里也提到人类在历史的汪洋中孤独漂流的故事。寻求救赎，比奋命逃生看上去体面得多，但其实，人类在灾难面前都是渺小得。巴恩斯善意、乐观极了，他说爱情可以挽救人类和历史，爱情就是这最后的“方舟”。不管那些高官达人如何作出决断，此时我们都不该去想像未来、去幻想自己的方舟，跟不靠谱的展望比起来，回忆似乎更老实一点。

韩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花城出版社，2010 年 4 月）**讲的是过去的故事，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显然属于回忆范畴。如果说前三部长篇，对于韩东来说还得益于以往的生活经验（甚至是生活经历），那么到了这部《知青变形记》韩东已经真正坠入完全虚构的快感体验中，用一种职业的、规范的虚构故事方式去构筑自己的那片星空。罗晓飞被安排当上知青，再被安排跟绍娜谈不明不白的恋爱，然后被诬蔑干下无人性的强奸母牛一案，为免逃一死，他再次被安排接替无辜冤死的范为国继续他人的人生……在这条被安排的人生道路上，罗晓飞随后更是踏上这条原本就无多少自我意识和选择的道路，被动送死，被动异想天开，被动求饶，被动真正变形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这荒诞的人生有多少是自己意料之中和自我选择的呢？“唉，他们总是这样，把我推来搡去的，也不打声招呼，使我陷入无法自主的境地。当年，把我和邵娜分开、让我和继芳在一起他们是这样干的……”多么无奈而又卑微的台词，可罗晓飞也许并不是一个奇遇，即便是他那富于戏剧性的遭遇中，扒掉必要的夸张外衣，他就是我们每一个生活中人。作者韩东也有意不赋予主人公罗晓飞过多的人物性格，磨去其尖锐个性的一面，使其顺利化身变形成为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有可能的人。

这些年流行出单行本，从杜拉斯到卡尔维诺，很多原来出版过合集的作家都被重新翻检出来，单行本当然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模式，但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说起来也真不错，至少看上去更舒服了，看书不仅仅是看字，还有一个阅读舒服的说法，否则看电子版、盗版不就都行了吗。对于有品质的作家，当然需要一个相应形式的书籍。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曾经出过两本厚厚的作品集**（《莫拉维亚文集》（吕同六主编，译林出版社，2002 年 10 月）**，从收藏来说，很经典，但翻阅起来的确不舒服，首先拿着就嫌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出版社重新发行单行本的行为不仅仅是炒冷饭，也有为读者着想的意思。**《鄙视》（沈萼梅、刘锡荣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有点像好莱坞老片的情节，动荡、绝望、悲剧，鲜明的时代背景，莫拉维亚深度解剖了时代背景下的夫妻之间、社会需求等问题。《冷漠的人》（袁华清译），是莫拉维亚的长篇处女作，一个濒临破产的家庭，风雨动荡中暴露了人类自身的残酷。莫拉维亚没有任何犹豫地将自己的匕首刺向了人类的虚荣，这一主题也几乎

一直延续了他后来的创作。这次集中出版的莫拉维亚作品还包括《乔恰里亚女人》（蔡蓉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同流者》（黄文捷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注意》（曹金刚，译林出版社，2010 年 5 月），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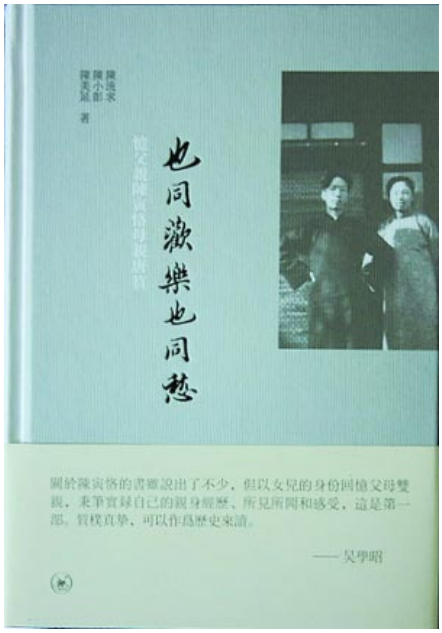
我们经常对很多欧洲国家的文学不太熟悉，这不仅仅是一种惯性的漠视，还有本身部分欧洲小语种文学的翻译不是很及时或者全面。幸好时常会有一些基金赞助、使馆的支持，这些看上去不大会有销量的书才会让出版社没有以断然拒绝的方式来面对。“瑞士当代小说译丛书”刚刚能见到，其中包括了《游泳回家》（拉佩特著，陈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5 月）、《阿格尼丝/如此一天》（彼得·施塔姆著，陈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5 月）、《耳朵没有眼睑》（施维特著，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5 月）、《假期伴侣——胡戈·罗切尔小说选》（罗切尔著，张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5 月）等，没来得及细看，粗略翻一下，我觉得这套瑞士文学编选的标准之一应该是好看、现实题材，这大概也是当下这个浮躁时代所能接受小说的硬指标了。个人比较推荐《假期伴侣——胡戈·罗切尔小说选》，一来一直对短篇小说有兴趣，二来罗切尔的故事总是具有小幽默，作家善用的短句子看起来也比较顺畅，没有花架子，这种很适合不明真相的时候走入。

喜欢外国文学尤其是爱雷蒙德·卡佛的朋友，可以通过各自的方式拥有一本刚刚出版的《外国文艺》（2010 年第 3 期，总第 192 期）。这本老牌的外国文学期刊我也好久没关注了，经过改版的《外国文艺》看上去很清新。本期大概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了两位作家：卡佛和耶茨，用一个标题来说就是“短篇会师”。本来就非常迷人的两位作家，这样一次集中阅读对于他们的读者来说真是非常享受。作品以及对他们的评论，交替着看，这大概只是看期刊才能做到。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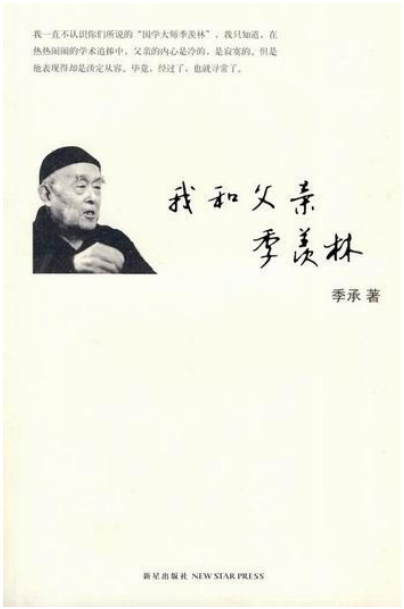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zhm7976@126.com）

上海复旦大学的骆玉明先生曾编著一册《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将具有“教授中的教授”之雅称的陈寅恪与钱锺书、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以及金庸、李泽厚等人一起入选此书，在学者骆玉明看来，陈寅恪作为纯粹的学术人物，能够被打捞出历史且成为当代文化的热点人物，具有十分复杂的时代背景，但其对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追求则无疑是文化界共同的言说话题。由此所形成的一个现象便是，尽管陈寅恪的学术著述十分艰深，少有人能够读懂，但决不影响他本身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符号。我自然无意去深入探求这种文化热点所形成的时代因缘，但毫无疑问的情况是，这种文化符号的诞生以及传播，其实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因为它一旦具有了某种精神的诉求，便会使得历史人物在某一方面获得最大可能的放大，正如骆玉明在此书的序言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人们关注名人终究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从中得到对所处生存环境的认知和在世间生活的资财”。



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遐想，也是因为读了由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所撰写的著述**《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与母亲唐篔》（三联书店，2010 年 4 月）**，这册回忆录中的陈寅恪，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陈寅恪对于国家与民族沉厚浓烈的感情，诸如书中所提到陈寅恪的两个女儿，一个名为流求，一个名为小彭，前者便是台湾的别称，后者便是彭湖岛，以此纪念国家领土沦丧的耻辱；而陈寅恪在日本占领北平之前，右眼有疾，本应及时予以治疗，但因为不愿意成为沦陷区的亡国奴，带领全家人辗转流亡，从而错过了眼睛治疗的最佳时期，最终导致右眼彻底失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陈寅恪即使双眼近盲，但依然坚持为学生上课，在民族危亡之中艰难地燃起了自己手中

的精神火把。可以说，读了这本书，便可以感受到作为纯真的学术大师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情怀之所在。广东的胡文辉先生所著的《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 6 月），便对陈寅恪生前诗歌创作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与阐述，印象深刻的还是陈寅恪在时代大变局之中，以诗词为途径来抒发自己对家国命运的忧患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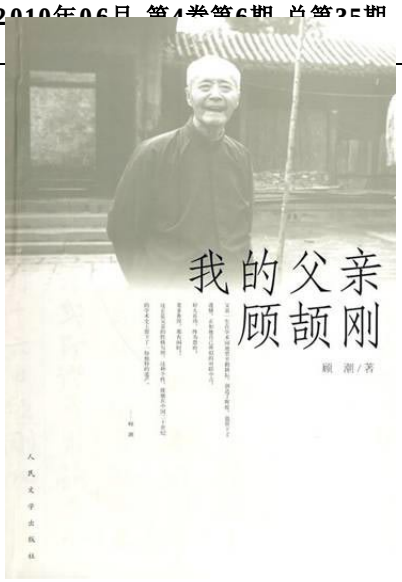
陈寅恪被广为人知，作家陆健东的一册《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三联书店，1995 年 12 月）有着重要贡献，此书重点书写这位学术大师遗留大陆的晚年残生，将疯狂年代一位敢于“逆流而上”的学者的精神风骨淋漓展露，其留给人们的思考便是一位学者在变化转折中去留选择，诸如遗留岭南的陈寅恪与定居美国的赵元任在晚年的巨大差异，难免让人不去思考由政治所导致悲剧的意味。然而由陈寅恪的三位女儿所共同写的这册著述，则将问题置换到了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他始终如一的民族意识，无论是留学回国还是辗转流亡，以至最终留做岭南人，都有这样的内心情结。作为名人的后代与学术研究者，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则是很难相同的，此书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却是陈寅恪与妻子唐篔的携手一生的坎坷命运，作者在书中给唐篔了几乎相同的份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家闺秀在历史波澜中的追求与奉献，其中写到唐篔的兴趣、经历、追求、学识、品行、情操，都让人为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感到幸运，更为幸运的还有陈寅恪在晚年遇到了黄萱这样优秀的学术助手，否则很难想像在那些艰难的岁月，这位目盲腿残的学者将会是怎样情景。作家韩石山曾用“黑沉中的亮丽”来评价这些优秀女性，我以为恰切而形象的。

这册著述让我更为真切的看到陈寅恪在 1949 年之前的人生风景，尽管少关学术，但三位晚辈的眼光无疑都是崇仰有加的，而近来所读的另一册由季承所著的**《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2010 年 4 月）**，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情绪。关于季羡林的传记以及各种回忆与研究著述可谓众多，但季承以儿子的身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着失败人生的学术大师。尽管季羡林在学术与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在世俗的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失败者，这不但是因为他寄人篱下的少年时代、勉强无爱的传统婚姻、无疾而终的异域情感、亲人接连的早逝离去，而且还是长期单调如一书斋生活，使他最终形成了一种远离尘世的压抑、孤僻与封闭，既让他分外的煎熬，又显然十分的享受。

为此，季承在写作上也有其用心之处，那就是对于自己没有亲历的事件进行了有意识的回避，尽力书写自己所见所闻的事情，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写作者的个人身份，作者不但是季羡林的儿子，同时还是一名事业有成的自然科学家，曾多年担任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的学术助手。我之所以强调这样的作者身份，是因为在面对日益不实的各类渲染中，这种勇于面对和敢于书写的精神，可以解释的就是作者几乎相同的创伤与疼痛。因为在对于父亲季羡林鲜为人知一面的披露的同时，也还有他对于自身的拷问、责难与反思。也尽管对于作者披露的诸多细节，很可能见仁见智，但它毕竟是真实存在过的，诸如季羡林对于家人的冷漠，作家就写到他从德国留学回来，握完儿子的手又迅速到水缸旁取水去洗；读大学的儿子曾向父亲借相机使用，却被严厉拒绝；与自己的妻子多年分床而居，甚至形同陌路；晚年曾有长达十二年的父子决裂，互相不得见面；如此等等的诸多细节，如果换在另外的一个研究者的笔下，很可能便是一种感天动地的淋漓笔墨了。

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作为一个学术大师，其本身同样还是一位散文作家，生前有着大量忆旧追往的散文作品，它们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资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季羡林生前很少触及自己种种有关家庭的矛盾和纠葛，对于自己心灵身处的个人纠葛也很少提及，他给世人所展示的大多都是一个和谐与美好的人生假像。但假使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直到历史最终只留下这一种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理解另外一种真实的存在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阅读季羡林的散文，那么很可能就会远离了真实，这很可能就是文学所不完美的一面，但遗憾的是季羡林生前回答很多人的提问时，一个最常用的答案便是建议提问者去读自己书写的散文。季承说，他的父亲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小宇宙，他在那其中获得了自我的满足与快乐。

读完这两册都是对于父辈人生的追忆，感慨于不同书写者所具有的不同视角，即便是自己的亲人，因为有些特殊的东西很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被放大或者缩小。读作家宗璞的著作《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 年 3 月），其中收录了近些年来自己关于父亲著述的文章，但全书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附录均是其他学者为父亲辩护的文章，以从侧面增加说服力，诸如对于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于冯友兰非议的反击。宗璞对于冯友兰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均持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特别是冯友兰在文革中作为“梁效”重要成员的一段历史，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以道德衡量历史人物是苛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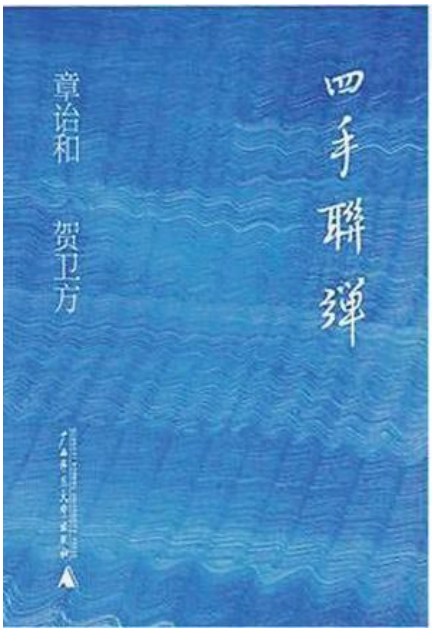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历史的制约。宗璞的反问不是没有力量，但由此却让我想到二战结束后审判纳粹战犯，许多战犯自我辩解自己是按照帝国的法律来完成任务的，但结果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审判，因为我们必须要明辨历史的罪恶所在。

而读学者顾潮的著述**《我的父亲顾颉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顾颉刚与鲁迅的学术公案，想看看作者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因为如果两个引人注目的名人掐架，无论为某一方作传，都容易变成拉偏架，更何况是名人之后。倒是顾潮的一个说法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有共同的追求，但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与和谐，顾潮认为其父亲因为与胡适这样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接触较多，从而导致与鲁迅这样曾经留学法日的知识分子之间存有较大的理念差异，如果稍有芥蒂，便会矛盾升级，甚至会引发冲突。粗读全书，顾潮笔下的顾颉刚，一生波折不断，但他对于学术的专注与执着，却始终如一，我以为这也正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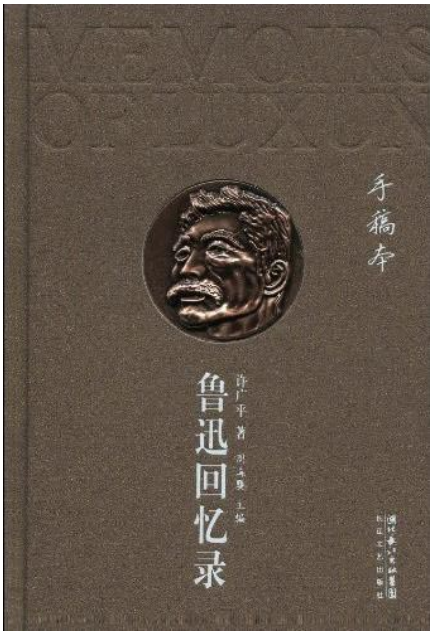
观察员　罗四鸨（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有朋友从外地来看世博，给我发短信：“我在世博园门口了!”一个小时后，再次收到他的短信：“世博园真没意思。”于是，他的世博园三日游计划半天便告结束。第二天，酷爱读书的他，将计划调整为逛上海书店，首选之地是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这是我乐意奉陪。

进入书店，门口推荐新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深蓝色的**《四手联弹》（章诒和、贺卫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4 月）**，“一个最受国人瞩目的人文学者”，“一个是最具争议影响的北大教授”，两人首次联手，让人不受蛊惑都不行。章诒和在序言中，这是“把我的戏剧和你的法学放到一个锅里去煮”，而贺卫方回答说：“煮出来的，便是‘戏法’”。或许，对于两位知识分子“世俗，趣味，随意”的雅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豆瓣网上长弓水手对此书的评论《马克思没有写过美食食谱》颇说出了几分我的感受，尤其是对章诒和文字的一段评价：如果说经济优越感是“有他人所无”，那么章诒和的文化优越感恐怕更多一层“无他人所有”的遗民心态，总认定了今日之好尚全都不忍卒睹，惟有旧时之节物才是永恒王道。这样的立场尤其体现在她对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认知上，在书中，超女、李玉刚等她皆有微词，大概是觉得浅俗到与昔日名伶判若天壤，甚至直斥中性化歌手为“阴阳怪胎”。

不过，这本华丽的书给我的最大感慨是，如今要做一个粉丝的代价实在是不菲，哪怕是知识分子的粉丝。全书大约 9 万字，竟有 269 页，定价 38 元。那毫无缘由的、时不时空上三分之二的页面，虽然好看，却便让我心疼。最让我奇怪的是，字却不大，让我看着依然有些吃力。这种图片说明式的断断续续地文字阅读，总让我有回到儿童时代的感觉。好在翻完这本书只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之后，我心安理得地将书放回书店。



相比做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粉丝，做鲁迅粉丝的成本似乎更高。因为前不久一位“被粉丝”的同门向我抱怨，32 元的不足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许广平，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年 3 月）**让他着实心疼了一番。同门论文是做鲁迅的，层出不穷的鲁迅研究著作已经让他有些捉襟见肘了，不过，我认为他这次的抱怨有些不对，至少《鲁迅回忆录》上那貌似铜像的鲁迅浮雕还是值一些钱的，更何况还是“精装、手稿本、尘封五十年手稿完整呈现”。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相对于这本“尘封五十年”的手稿本，我感兴趣的反而是 1961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个版本。据周海婴介绍那个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的，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的，因此书中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够反映真实的鲁迅一生的书，就是许广平的“手稿本”。据说，其中关于鲁迅讲演与讲课一段，手稿在本章开始用近乎三段的文字对鲁迅的外貌、神采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而 1961 年版的《回忆录》对此只保留了一句，此外，旧版本还将手稿中出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不过，我看着手稿本中对鲁迅的外貌、神采进行生动描绘的三段，以及重新恢复的对周作人的评价，实在琢磨不出其中的区别与意义，不禁兴味索然，只能再次将书归还原处。

与做某个人的粉丝相比，我倒心甘情愿做某个品牌书系的粉丝，比如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社会思想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格致学术译丛”与“都市文化研究译丛”，以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前沿”与“开放人文”等，与八十年代的许多著名书系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20 世纪文库”、“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现在的“新知文库”便是对它的传统的继承）相比，或许少了当年的那种磅礴与影响，但思想的锋芒与开放，甚至朴实无华的装帧，依然可以直追八十年代这些书系。虽然八十年代那些书已被“雨打风吹去”，好在有这些新书系聊作慰藉。若是将这些书系的书目列出似乎有广告嫌疑，暂且推荐其中两本新出的书：

第一本是**《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菲利普·津巴多著，孙佩奴、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 年 3 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试验——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 年，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招募了 24 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大学生扮作狱警与犯人，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心理实验。这 24 名大学生随机分为三组：9 名犯人，9 名狱警，6 名候补，然而六天后这个实验便结束了。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天使堕落成魔鬼，好人变成了坏人：扮成狱警的原本纯良的大学生有了某种特权，已经变得残暴不仁，而扮演犯人的原本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已经几近崩溃，这就是所谓的“路西法效应”。而这本书便是这个实验的实施者津巴多所撰写的。从这个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以及种种社会现象，作者借此分析“情境力量”和“团体动力”是如何能使平凡男女变成残忍的魔鬼的，而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呢？在这本书中，这似乎并不重要了，但却需要记住人性的无比脆弱，并借此了解自己、抵制路西法效应，最后感谢生活中平凡的人。

第二本是**《水晶之城——窥视洛杉矶的未来》（迈克·戴维斯，林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这本书是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策划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中的一本，虽然一直不清楚这个有些奇怪的研究院的性质，不过这套书正如其出版说明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生土长的作者用本雅明的话说，“不是白白在那儿长大的”，用其爱恨交加的笔描述出洛杉矶这座大城市“经济繁华的表象之下”，“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从海外的日本资本到本地的黑帮，从洛杉矶的警察部门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以及被“极权”控制的公共空间。或许，借助洛杉矶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过去与未来。

待我做完不忠实与忠实的粉丝，新晋法学博士的朋友竟然挑了八本书，作为他的粉丝，我愿意再推荐他挑选的其中三本：

《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涛慕思·博格著，刘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5 月）《身披法袍的正义》（罗纳德·德沃金著，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劳伦斯·E. 哈里森著，严春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 4 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粉丝的话依然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我想推荐的是《炎黄春秋》2010 年第 5 期上的两篇文章——郭宇宽的《寻找王佩英》与周筱赟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前者讲述了一位普通女子王佩英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在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还看了其儿子张大中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若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发邮件到 wpyzl@vip.sina.com，可免费索取。后者则对比了如今正如火如荼的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不同的舆论生态：一个“全部是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一个是“打开报纸天天是批评”；一个是唱“不和谐”歌曲请“喝茶”，一个是散发传单而受到感谢；一个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无人敢质疑，一个是常务副市长公开质疑工程背后的官商结合，为此，作者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为“独立阅读”写作了将近三年的“思想/哲学”报告，笔者不敢以专家自居，这段写作经历实际上也是自己在摸索思想与生命的关联，在这浩如烟海的哲学思想卷册之中，哪些内容能为自己所用，哪些能落实于自己的生命实践之中，但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著作不仅无法给人启发，反而常常是误导性的，这时常让我感到迷惑：思想哲学类的那些名目繁多的专业书籍，当真对我们的生命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可以行诸于日常生活而不悖？

这个老问题注定难有什么新答案。我不想否定学院里的哲学研究与探索，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如今大多数的哲学著作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尽管专业学者会声称，专业化的哲学分析是对思想的细化与深化，知性探索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当然它们可能与写作者本人发生或多或少的生命关联，但对于那些从未受过专业化哲学训练的人而言，为何他们需要阅读一本需要数年专业哲学知识储备才能理解的著作来为他的生活指引方向？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不离生老病死几大问题，另外有一些问题可能比较重要，但是并不一定普遍。仔细想想，我家乡的那些山民们，并不需要什么哲学，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思想，他们只需要妥善安排“生活、养老、医疗与安葬”，其人生便已服帖和顺遂，作为人生意义的安排，他们的传统生活已经提供出一套解释与心安的理由，而如今越来越剧烈的“生命意义匮乏”感，追根到底在于城市化的过程给传统意义解决方案提出挑战，怎样的生活才是我们所想要的？就如从富士康的宿舍楼上纵身一跃的年轻生命，他们从小镇、乡村来到都市，为了追寻理想的生活，却不想遭遇到的是这样一种机械、冷漠的生活方式，面对今日四处林立的“血汗工厂”，我们真有其他选择吗？

对于富士康公司陆续跳下的那些年轻人而言，“死亡”似乎越来越如轻雾一般，“生”如何会沉重到足以撑起“死”的一端，以至于最后可以毫不留恋地放手，让自己去迎接那不可预测的未来？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假如我能面对那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我们有什么理由，又拥有什么力量让他们重拾信心，善待生命？

这让我想到前年发生的一个故事，媒体人石扉客的表弟罗炼在珠三角打工，但是突然神秘消失，不见踪影，关于他为何失踪，只有他留下的 一张字条为证，那是庄子《齐物论》里的名句：“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分明是感到人生的无望，产生强烈的出离心，但是出离并不一定就要“消失”，也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寻，不过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却从未让他们有机会去选择“别样的生活”。

最近偶然间请到苏州西园寺的济群法师所写的一系列“谈人生”的小

册子（http://book.jcedu.org/），里面如有“佛教怎么看世界”、“学佛与做人”、“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等等，读完之后，甚觉有必要推荐给那些对世界、对人生存有疑惑的朋友们，我甚至想，假如这些小册子能在富士康公司的年轻人中间分发，或许会比富士康公司里那聊胜于无的心理治疗室要更有效果，事实上，西园寺近年来已经开始探索佛教修行与心理咨询与治疗之间的相通点，并且还专门组织了心理咨询师的禅修营活动，也让我们依稀看到民国一脉下来的“人间佛教”之理想。既然提到“人间佛教”，这里顺便强烈推荐印顺导师的一个系列纪录片《印顺导师传》，土豆网上可在线收看（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8670649），我曾将此片与朋友分享，朋友看完后，极为感动，片中脚本台词，大多取自印顺导师的传记《平凡的一生》，读过传记的朋友或许会感受到，印顺导师的文字平实却有一股深沉的力量，让人能强烈感受到生命的深邃与无常。对于这样的文字，我还能说什么呢？还是留待各位朋友自己细细体会吧。

下面想介绍的是民间独立作家野夫的著作，野夫的文字大多都是为逝者所写，“生死”的主题，如果不是野夫刻意所为，至少也是回忆中不经意间所抹出的沉重。 野夫的名篇《江上的母亲》早已在网络上流传，如今文章结集出版而且获得台北书展大奖，自然是对大陆为数不多的独立写作的最好褒奖，而且于我比较特别一点的，野夫算是我的老乡，当然严格说起来，我们生长于不同的县城，而且也属于不同的代际。读他的**《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 年 3 月）**，让我既有熟悉感，同时也会觉得十分陌生。野夫的家世相比恩施的土著山民而言，相对比较复杂，其母亲来自江汉平原，而父亲则是本地土著后裔。不过这本也不奇怪，历史上几次大迁徙，恩施一地有大量的外省移民进入，而土家族的形成，其实就是汉人与本地原住民杂居所形成的特殊族群，“亦汉亦蛮”。在近代史上，恩施一地在许多人的笔下，只不过是避难所而已，这缘于绵延险峻的武夷山脉阻挡了日军的入侵，所以美军曾在此地修机场，而许多江汉平原的学校也一路撤退到这“阳光晒不到的”山窝窝里。野夫笔下的家族史，是这个隔绝之地与山外那个大时代因缘际会交错而展开的一段悲情故事，这种悲情，在我熟悉的“乡土记忆”中是付之阙如的，也让我常有错觉，野夫笔下的恩施，竟然带着一股“异域风味”。

前面的文字或许都太沉重，还是来点让人期待的内容吧。德国科隆剧院将在 9 月来华演出瓦格纳的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这简直点燃了国内瓦迷们的贪婪之火，不过要想完整听完这部大制作，各位还需掂量荷包与自己的身体，全剧会连续演出四天，长达 15 个小时，不过转念想想，这总比提前 10 年去订拜罗伊特的票还是要轻松不少吧？谈到瓦格纳，最近有本**《巨人的聚散：尼采与瓦格纳》（冷杉、杨立新译，三联书店，2010 年 4 月）**是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通信，仍然是讲的他们两人的恩怨，关于这段往事，本是德国音乐史与思想史上的“典型性事件”，不过想要讲的清楚明白，并不一件容易的工作，各位如有兴趣，还可以参考尼采本人所写的《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里面有不少批评瓦格纳的精彩语录，值得一读。

最后想介绍的一本书是介绍几大文明系统的一本通俗读物——凯伦•阿姆斯特朗的**《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孙艳舞 白彦兵 译，海南出版社**，2010 年 5 月），此书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显得相对浅显，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则算是一本不错的读物。

图 1 为济群法师

HISTORY&CULTURE 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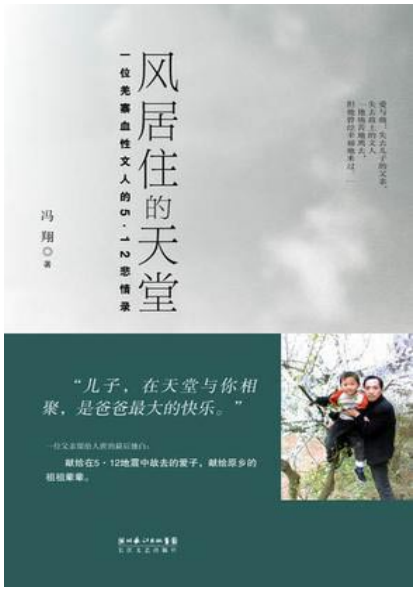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wxy1978@hotmail.com）

我对很多“国际友人”深恶痛绝，更赞同鲁迅先生的名言：“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在 2010 年 5 月 31 日《南都周刊》上，读到这么一段话：

“为什么给这本书起名叫《当中国统治世界》？”马丁•雅克激动了起来，竖着指头对记者说：“你听我说，不要打断我——这是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没有，英国没有，中国也无法统治世界”。

“因为中国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整个世界”，所以写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鼓舞士气，这就是左派教授马丁•雅克的辩证法。有人把它当做学术著作，我看是科幻小说。所谓“中国模式”，基本都是用科幻小说治理国家。

在马丁•雅克环游中国之际，德国青年卢安克安静地在广西山区从事着“传教”工作，不是传播宗教，是传播“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的教育理念。1997 年，卢安克到广西投身于儿童教育，他申请就业证和志愿者，未遂，曾因无证授课被罚款。在献花也被宣布为非法的国度，“非法志愿者”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但是，卢安克依然在广西“潜伏”。2010 年 5 月 20 日，卢安克因为众所不知的原因宣布关闭博客。此举引发网友围观，在豆瓣，有上千名豆友期待看到卢安克的这本旧作**《与孩子的天性合作：一位德国青年在中国的教育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期待出版社能够再版此书，一解网友之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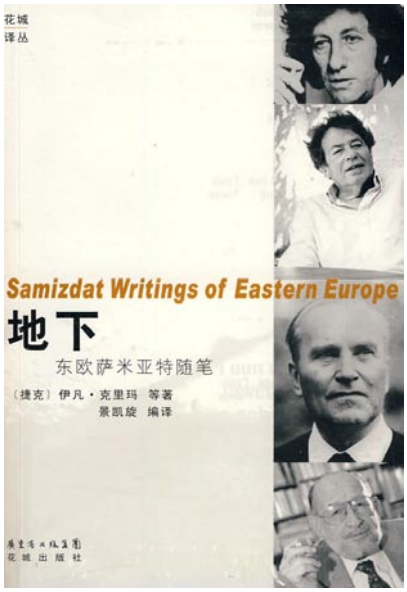
另外两本我尚未见到但准备买下的书是冯翔先生的**《风居住的天堂》、《策马羌寨》（均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年 2 月）**。冯翔，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说过但早已遗忘。他曾任四川省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2009 年 4 月 20 日于家中自杀身亡。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登陆他的博客，意外地发现这位官员的文字纯净并且具有反思性，完全不是真理部的路数，如同《1984》里同样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后来在推特上得知，艾未未搜集的地震遇难学生名单，有一些是冯翔透露的。在一个内地的县城，这种人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消失反而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次出版的冯翔遗作，收录了他的一些少作，文字或许有些简陋。但是，我愿意买下他的书，以表达对他的追思。

最近还看了艾晓明先生的纪录片《我们的娃娃》和《公民调查》，地震之后，央视的报道从未让我感动，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些冷血。看了这两部纪录片，终于确信自己并不缺乏感动的能力。《我们的娃娃》里学生家长深夜潜入被封锁的学校，搜集起诉证据，再次说明“人民素质还不高”是怎样一种谎言。《公民调查》里杨立才回答为什么要参与公民调查、谭作人的女儿回答怎么看待父亲，都拒绝了“悲情叙事”，他们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更有杀伤力，闻之动容。

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 年 3 月）**能够出版，有些出乎意料，有的网友甚至表示，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欲购从速。在此前的“独立阅读”里，我曾经推荐过这本书的台湾版**《江上的母亲》（台北：南方家园事业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当时也一度认为大陆读者只能阅读盗版。《尘世•挽歌》有些删节，或许出于无奈，但有些改动更为合理，比如《地主之殇》改名为《乡绅之殇》，就有些正本清源的意思。“地主”是阶级叙事的词语，常被等同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乡绅”回到历史叙事的框架，他们为乡村自治做出巨大贡献。可惜野夫近作《民国屐痕》，没有收入此书，诸位搜索一下即可大快朵颐。

清华大学恢复了国学研究院的建制，出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先期出版的有丁文江、赵丰田先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和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篇》（中华书局，2010 年 4 月）**。前本书的出版对于《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4 月）是一个打击，因为两本书内容大体一样，中华书局版定价 96 元，上海人民版定价 120 元。《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的出版，让人生发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慨。编者卞僧慧已经是白寿（99

岁）老人，1995 年年谱曾有出版机会，但是需要大量阉割，为这位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拒绝。这本年谱我尚未细看，随便翻阅了几处。1932 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有一道对对子的题目是“孙行者”，已成佳话。但是根据年谱记载，当时报纸有很多非难，为此出题人陈寅恪曾撰文详细解释，可见佳话诞生的时候未必是佳话，更有可能是一场事故。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最近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三联书店，2010 年 4 月）**，作为晚辈，她们应该对“开天辟地”之后的事情更为熟悉，可惜只讲到“开天辟地”之前就悬崖勒马。这与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的“上班记”想必更加精彩。



季承先生的**《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2010 年 5 月）**，特立独行。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只能看到对昔日敌人的指责，看不到反思，从此就对这位“国学大师”失去了兴趣。但是他坚持一字不删的**《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3 年）**让我对他的印象稍有改观，日记中的一些片段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诸如“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读来非常亲切。在季承的回忆里，父亲除了对猫比较亲切，对家人相当冷漠。有人批评他没有为尊者讳，却忘了“避讳”是中国文化的糟粕。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 年 5 月），适合在这个敏感词的月份里阅读。阅读着几十年前的文章，我所想到的是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

图 1 为卢安克和他的学生

阅读报告 • 台港海外

HONGKONG 香港

也斯的香港

特约撰稿人 严飞 （美国•旧金山，fei.yan@green.oxon.org）

我对诗歌没有天赋，也所知甚少，只是粗浅地从艾青入门，读北岛、食指、海子、顾城、于坚。他们的诗总能进入我心灵的最深处，拨动我的神经，让我在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点上，觉察出自己一种近乎原始的渴求和诉说。不过到了现在，这样的诗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的所谓“梨花体”，这对于诗歌而言，真是一种反讽。

但是有一天我读到女诗人尹丽川从北京后海喝酒回来后写的两句话，立马灵魂受到了想象力的强烈冲击，史学的镜像和美学的视像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停罢。我知道，我一定是哪根神经突然错位，否则不会这么激动，并且发出文人才有的嗟叹。北京朋友若是知道我这个连北京都没有正儿巴经待过的人竟然会如此，定会认为我多愁善感，外加一句“不靠谱”。

尹丽川只是写道：“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我们去后海看雪，就回到明清。”

之所以扯到我对诗歌的认识，是因为我在读香港作家也斯（梁秉均）的诗时，似乎总是难以生发出同感式的共鸣，甚至连图像的影子都没有。事实上，在也斯的香港诗歌中，经常会出现旧时香港的琐碎景象与人物，这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很多香港本土作者的叙事潮流——从旧时香港的老街道、老街坊、老味道、老故事中缅怀，进而追寻自己的香港本土意识与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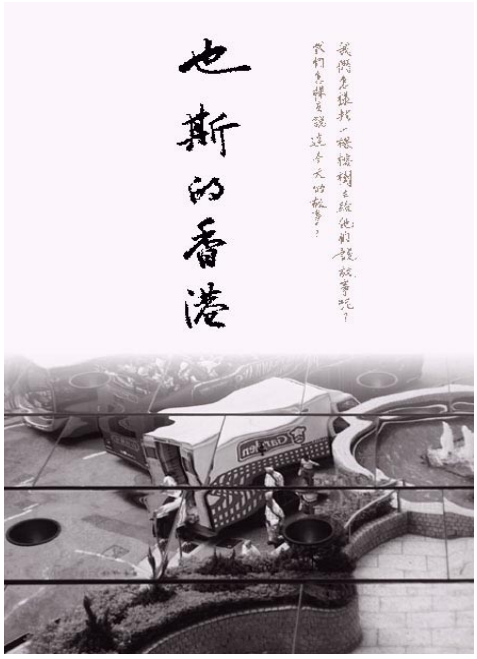
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明明在香港的时间远远多于北京，对香港的认识也远远胜于北京，可就是无法从也斯的诗中读出香

港呢？也斯曾说过，他最不能忍受来自外地的作家对香港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因为“这很容易变成猎奇式的浮光掠影”。我想这应该出自我的身份原因，没有在香港有过一段成长时期“刻苦铭心”的记忆，这大概是我尝试以“在地”姿态解读香港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硬伤。

然而我在翻看也斯的散文集《也斯的香港》时，却发现了他文字中情深意绵的另一面，以及另一个香港。

《也斯的香港》记录了也斯所捕捉到的香港一些典型或者不典型的人物和地方，最早的一篇闲谈书与街道的文章竟然写于 1970 年，可见也斯记录的香港，是一个三维度的香港，加入了时间这一重要元素。同时，也斯又很爱撷取城市中的某个独特侧影，例如柴湾的一棵榕树、北角的一间食货铺、小说家刘以鬯的一次创作冲动，然后通过可能并不显眼的日常生活描写，从点滴中让读者去感受香港的面貌。

这就和诗歌不同，散文长短句的描摹更加应景和具像，即便思维的跳跃促使作者必须在两段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段落中游走，但由于主线并未有抽离，所以实际上反使文章增添了色彩，增添了情趣。



例如，也斯在描写好友叶辉的《从瓮中长大的树》一文中，将与自己一样成长于六七十年代，在种种混杂文化背景下汲取营养的香港文化人譬喻为“我们都是从瓮中长大”，并且进一步指出：“在香港长大，其实也是在种种限制中长大。因为限制特别明显，也分外自觉去超越它。幸好瓮口总可以张望天地，瓮内也有宽大的圆腹。”这种“瓮中树”的思想又贯穿于也斯的其它文章中，可以是在香港挤迫空间中无家可归的诗（《兰桂坊的忧郁》），可以是在繁华喧嚣的上环高楼间鲜艳的画作（《在上环绘画古诗》），也可以是北角破败市井中不少朋友彼此交叉相汇的童年（《镜像北角》）。也斯在重现他们这一代对香港文学和文化的贡献时，也将“瓮”的概念流线化，瓮的体积在时间的长轴上越来越大，而瓮中人的呼喊和抗争却越来越弱小：

> 香港作为写作的环境的确愈来愈不理想，发在综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检查、删改，或因编者的疏忽、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而变得面目全非。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感到寄人篱下之苦。在香港写作这么多年，最近可是愈来愈感到专栏的水平低落，不负责任的意见充斥，流行言论愈来愈张狂，要发表不同想法愈来愈难。香港是我的家，写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象也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地方说想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兰桂坊的忧郁》）

这是一段具有抗争意味的文字，也是一段忧心香港逐渐失去本我的呐喊。所以，相对于诗人也斯，我更喜欢散文家也斯和他笔下的香港。也斯沉浸于香港的瞬间意象，再演化成故事，娓娓道来。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香港的城市外貌老被地产商所支配，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老被媒体轰炸所淹没，也斯不过是在想：“那些小路旁边的事物，那些没有放大登上报刊头版的人，也许也有他们值得听听的故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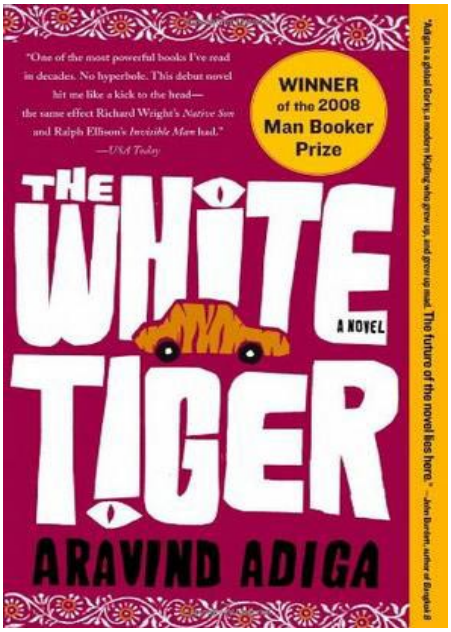
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 年 2 月。

INDIA 印度

谁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埋单？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　（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当我合上小说《白老虎》（The White Tiger）的时候，电视里传来这样的新闻：“印度的金融中心孟买的一家房地产集团耗资 4.4 亿美元，要在当地兴建一栋超过 440 米的世界最高公寓楼。主体大楼将拥有 300 多套公寓，小区内有大片绿地、多家咖啡馆和一处露天天文台……”这让我想到最近印度接连不断的新闻，一会要从澳大利亚进口核子原料，一会要从中国购买预警机，再不然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建高楼”、“造大船”之类的“当代奇迹”。



这些带有严重《环球时报》语气的新闻真的告诉了我们现实中的印度吗？我想，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已为我们把真实的印度描绘得够清楚了，那一条条臭水横流，暴力肆虐的街道，狠狠地抽了官方版的“白象崛起”一个大嘴巴。但这就够了？不，《时代周刊》的驻印度记者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决定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耳光响亮”之外，再给那个表面光鲜亮丽的“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一记重拳：在那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国度，人们的内心世界竟是何等的冷漠、荒凉与幽暗。

作为小说家的阿迪加的视野完全是福柯式的，但其小说的可信程度却远高于时常把文学艺术与历史混为一谈的福柯先生。现实中的印度历史完全成了由小偷、罪犯、街头艺人构成的一幅生活图景，严格的记者训练背景，让阿迪加的笔触更具有新闻写作的坚实基础。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孟买的火车站、巴士站以及贫民区闲逛，和身边的人聊天。”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己在动笔前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做得多么扎实。这不仅是为了“保证本书的所有细节都和印度的现实能联系起来”，更是因为作为商业记者的阿迪加深知“那些写在商业周刊里的关于印度的内容基本都是些牛屎。”因此，他拒绝继续用硬通货式的杂志语言向读者传达一个错误的印度，于是辞职并操刀写起了英文小说。

“总理先生，我俩都不说英语，但有些事情只能用英语说”，《白老虎》是以一封写给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信件开始的。事实上，整个小说是由印度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巴尔拉姆写的七封信组成，描述这位小说的主角如何从黑暗的贫民区翻身成为一名商人——计程车公司的老板，但他的真实身分却是来自贫民区的一名“不可触摸者”(untouchable)。只是，这位出生低微的“贱民”并不甘心终老于笃信“做了坏事家里的水牛就会生病”这种愚蠢信念的穷乡僻壤，而执意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幼年开始，巴尔拉姆的梦想便是成为“白老虎”——稀有、高贵的孟加拉白虎。但想要改变自己身上的固有血统，在弱肉强食的印度，只能通过血的代价。他的第一手段就是软磨硬泡、甚至是耍无赖的方法成为一个富有之家的私家司机。尽管几乎不被当成人看待，他仍然表面上死命效忠主子，实则阳奉阴违，时刻想着如何搞垮潜在威胁自己地位的人，他甚至在故事的最后杀死了主子，带走其钱财逃往班加罗尔，并且堂而皇之做起了血汗生意。

如果我们同意昆德拉关于“小说是道德悬置的领域”这一论调，那么《白老虎》一书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内容，则让它在避开了道德家们“诲淫诲盗”的病诟之后，让读者得以一窥现代印度的心灵。奈保尔在他 30 岁那年回到印度时，发出过这样的谓叹：“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熟视无睹的东西就是现实。”当时如此，今不亦然？奈保尔所魂牵梦绕的那个只有在他童年出现的印度，而今在阿迪加的笔下成为了如此残酷的现实：这里只有两种人，“大腹便便的人和小肚子的人”。传统种姓制度的解体让财产的多寡程度迅速成为种姓的替代品，成为划分人与人差别的唯一标准。有时候这种区别直接关乎一个生命的存在与否：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地区，巴尔拉姆的父亲死于肺结核之类完全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在繁华的孟买、德里，这几乎只能当一个笑话来听，这让内心善良未泯巴尔拉姆感到震慑，而当主人的女友驾驶他平时所开的汽车碾死一名穷人的孩子时，他目睹了这一干人等如

何通过贿赂警察来逃脱杀人的罪责。

传统种姓制度的躯壳没有了，但新的种姓制度却凭借国家经济的起飞而建立起来，而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阶级区隔仍然没有改变多少，这就是阿迪加眼中一个国家的“崛起”背后的代价。超过 4 亿穷人的国度，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爬到所谓企业家的位置，其间需要经历些什么？虚伪、狡诈、冷血，还要一点把握机遇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信仰吗？印度教有着超过三千万的众多神祇，这反而令这些神祇形同虚设。“这些神待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就像印度无所作为的政客，他们居然还因此不断获得选举连任。”这是巴尔拉姆写给温总理信中的一段话。

有现代民主制，有历史悠久的宗教，有经济奇迹，也有一流的企业家。这貌似配置优良的组合，并没有为大多数印度人带来必要的幸福，反而在让一部分印度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把大多数人的公平和富裕弄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白老虎》中的印度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热带雨林，人们的生存之道完全遵循于原始的“丛林法则”，与人类文明社会的法则毫无关系。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嗜血的孟加拉白虎才会更有竞争力，会活得更自在。

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埋单的却是绝大部分民众，那么这样的崛起意义何在？巴尔拉姆在小说里以预言家一般的口吻说：“在 20 年的时间内我们棕色人和黄种人会占据金字塔的顶端，我们将统治世界。”这是作者的反话。回想 1947 年 8 月 14 日印度迎来现代民主政权的午夜，总理尼赫鲁在红堡发表的演说：“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二者的语气是多么相似。

这种相似的后果只是让阿迪加对于自己出生的国家越来越感到陌生。“2003 年，我奉命回到印度做通讯员，这是我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回到印度……但我经过一周的旅程所发现的却是，我居然对自己的故乡毫不了解。”阿迪加在一篇文章中忧伤地写道。这种陌生感迫使大学期间嗜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他选择用虚构的故事勾勒自己亲身观察中的那个诡谲的印度，不仅仅为了述说，更要为印度这出喜剧底下的悲凉，找一个注释。

***The White Tiger*, by Aravind Adiga, Free Press Paperback, Oct 2008；**

[印]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路旦俊、仲文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4 月。

图 2 为阿迪加 2008 年凭借《白老虎》获得布克奖的情景

BOOKREVIEW 书评

夭折的上帝与有待“救赎”的人心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最近，著名的观念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正在中国访问，这次“迟来”的中国行本应是去年的计划，但却因马克•里拉的私人原因而延宕至今。马克•里拉在中国的名声鹊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考究其原因，除开其文笔洗练、可读性强之外，也与他所研究的主题切中时代精神有莫大的关系。此次马克•里拉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两次演讲，一是“论反动”，一是谈“上帝之政治”，前者主要以反对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潮为主题，后者则是他在 2007 年初版的新书《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里所阐发的议题：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要了解马克•里拉的思想主旨，或许有必要先探究一下他的学术与思想之路。如果按照履历来看，马克•里拉的学术思想之路并不十分“科班化”，甚至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他本科选修的是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硕士阶段则选择的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政策专业，从任何角度看，他所走的是一条以“实用”与“实证”为主线的受教育之路，与“政治观念史”几无任何瓜葛，但是在“干

中学”（时任《公共利益》杂志编辑）的经历中，尤其考虑到当时他所在的《公共利益》杂志的主编是新保守主义领袖人物欧文•克里斯托，他对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逐步自学进修，最终萌发了去拿个博士学位、踏入学术圈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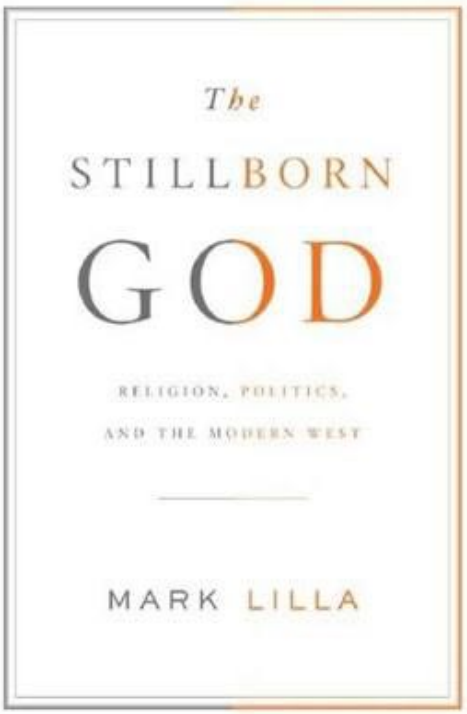
而这一念动起，却也成就了马克•里拉的学术机缘，因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当时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两位大将坐镇，一是茱迪•史珂拉（Judith. N. Shklar），一是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里拉还有机会得到绰号为“哈佛大炮”的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耳提面命。这三位名教授的思想背景，都给里拉带来了深刻影响，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尽管他的政治态度也曾经摇摆于自由左派与新保守主义之间，而他如今却自称为“后堕落论的自由派”（见刘擎《哲人与政治——对马克 • 里拉教授的访谈与评论》）。

这么看来，马克•里拉虽然从自由派与新保守主义两方都汲取了思想养分，但是很明显，他受到茱迪•史珂拉的影响，要甚于斯特劳斯学派。最为明显的一个思想特征就是，史珂拉对乌托邦思潮的敏感与反对，以及她所具有的温和怀疑主义色彩，都在马克•里拉身上有所折射。在这些方面，里拉无疑是继续推进了其师的思想，史珂拉反对与启蒙运动相伴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幻象与迷思，将种种乌托邦思潮归结为某种“从忧思到乡愁”的演变之路，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而引发的“盲目返回古代”的原始冲动。不过，里拉虽然沿袭了史珂拉的这一思路，但是将这一视域进行了扩展，其最终成果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一中译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西方》。

讨论此书，尽管可以依据里拉自身的自由派思想脉络来评说，但是笔者却想引入另外两位思想迥异的政治科学家（谢尔顿•S. 沃林与埃里克•沃格林）来略作对比，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定位里拉的思想主旨。

里拉在交代此书缘起时开章明义，一种以神学的整全性所主导的政治观念与现代新型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前者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神学，按照里拉的解释，也就是说带有启示性格的救赎教义，是如何规定与指导政治实践的。

今日之政治哲学家，面对“政治神学”，大抵都会认为现代性已经将其打入历史故纸堆中，已成明日黄花，未来只需构建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就可开辟出适合当下与未来的政治道路。如美国的激进左派思想家谢尔顿•S. 沃林，也曾写过一本大部头的政治思想史——《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在他看来，无论是柏拉图的那种以伦理指导政治的思路，还是中世纪用福音进行治理的努力，都最终宣告失败，而现代政治的最大成果，就是将政治秩序成功地从“上帝恩宠”中分离出来，所以沃林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看作是政治理论首次以自主性面目出现的现代方向，也就是说，那种以“天国共同体”为目标的教会政治模式，已经宣告破产，路德的新教改革，也只不过加速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分离，“启示得救”开始与“世俗政治生活”分道扬镳。



假如单单从这里观察，马克•里拉基本上会赞同沃林的分析，在《夭折的上帝》一书中，里拉最引人注目、也引人诟病的就是关于“大分离”的论述，不同于沃林以马基雅维利为转折点，里拉将霍布斯看作是将神学与政治成功分离的先驱者，因为霍布斯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人对自然的恐惧感，是人的欲望和无知的表现，与其让人们所信仰的诸神互相厮杀，还不如另立一个新的“利维坦国家”来全权掌控世俗政治。显然，在霍布斯的假设中，人是一种欲望动物，信仰上帝只不过是因为恐惧与敬畏，要解决宗教战争问题，就需用一个专制型的国家来维持秩序，正是在这里，以“世俗秩序”为最高目标的现代政治哲学开始萌生。

但是，里拉毕竟不是一位激进民主派，他不像沃林那样，认为现代政治领域已经完全驱逐了启示与福音，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就只剩下“民主参与”。沃林曾说，“政治参与的结束时刻也就是民主失落之处”，这种“瞬间式”、“朝生暮死式”的政治特质，甚至有人将其与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相提并论。但显然，里拉虽认为政治与启示宗教有必要分离，但毕竟承认，这种分离并未完成，而且可能最终也难克竟全功，这也意味着，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保障，仍然时刻面临着弥赛亚许诺的威胁 ，这种危险，在第三帝国那里已经得到最为残酷的展现。

不过，这种启示宗教的威胁，当真是因为政治与宗教没有完全分离所造成的？抑或还有另外的解释？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会有明显不同的回答。不过有必要提及的是，涉猎过沃格林著作的读者，或许在阅读《夭折的上帝》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关于政治弥赛亚主义方面，几乎与沃格林在《新政治科学》里所提到

的灵知运动如出一辙。在本书中，我并未查到任何关于沃格林的注解，但是里拉显然是了解沃格林的，在 2007 年的其中一期《纽约书评》上，他曾就《沃格林全集》撰写过书评，但里拉并没有完全把握沃格林的立场，他似乎认为，沃格林只是一位“西方文明危机”的诊断者、艾略特笔下那位拥有自由心灵的“卡索朋先生”（Mr. Casaubon），而没有看到沃格林对近代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包括自由主义）的批判背后，到底缘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思考。

与里拉不同的是，沃格林并不认为政治与宗教有必要分离，首先，对于历史而言，一旦我们用分离的视角去考察，将无法理解大部分文明的政治实践；其次，近代以霍布斯所开启的所谓政治与宗教“大分离运动”，只不过是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另一种扭曲形式，即一种“内在化的世俗超越模式”，单单以个人主体出发来思考超越性问题，这是“谋杀上帝”之后的结果，虽然摆脱了天启式的救世论，但却陷入另外一个以历史进步为名的新约束之中，而且还时刻受到极权主义的诱惑，例如各种以“启蒙”话语为基础的帝国扩张运动。

虽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处在圆满性和动物欲望性之间的神秘造物，但是他也从没有期待某种圆满性或神启突然降临于世间，他反对灵知式的天启教义，也反对近代启蒙运动所颠倒的灵知内在化版本。马克•里拉认为霍布斯成功地将天启政治与世俗政治区分开，但是沃格林却认为，一旦抛弃启示与福音，在霍布斯之后的长长队列里，人类实际上依靠自身创造出了各种弥赛亚性质的人造宗教，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一个异教式的政治建构，而并不是里拉所讲的“大分离”。

无论马克•里拉对自由主义立场的坚持缘于的是人性怀疑论，还是对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信心，或许都与沃格林的看法相左。甚至可以如此理解，在马克•里拉感到悲观之处，正是沃格林充满期待的内容，而在沃格林感觉悲观的地方，对于马克•里拉而言，却不构成任何问题。

沃格林显然会认为，自由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不足，而这种缺陷直接影响到对政治的认知，而自由主义对制度建设的乐观情绪，沃格林也曾在 1964 年的“社会与历史中的人”一文中加以批评。因为沃格林会认为，制度的建设有赖于对人的神秘性有充分的认知，才能让政治秩序的复杂性得到展现，他如此论述道：“当市民非常积极地在法律中寻找这样或那样的漏洞，但却不敢触及大家众所周知，各种小恶的根源，苏格拉底将这看作是城邦的症候。他们的行为有如病人，永远追求着万灵药，但是却不愿意修补其生活方式之病症的根源…城邦善的根源不在制度的范式上，而是在于开国者或统治者的灵魂，他们会将其灵魂的印记铭刻在制度上。”

当然，马克•里拉可以如此回应，他在书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要比他所强调的内容要更多，这也是他在附录中与卡萨诺瓦

以及查尔斯•泰勒的讨论中反复强调的立场。但是里拉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大分离”的论断，仍将会不断受到质疑。这些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对具体历史经验的阐释，一方面则来自于对“人”的意识及其活动复杂性的理解程度。如果说里拉的精神导师史珂拉始终沉浸在一种“消极”怀疑论的情绪当中，试图避免作任何正面的政治建构，里拉则明确地提出政治与启示宗教分离的主张，但他也悲观地认为，“政治弥赛亚主义”随时会崛起，对自由民主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就像他常常提到的那封伊朗总统内贾德写给小布什的那封充满神学语言的公开信一样，似乎是政治神学在场的铁证，对自由民主社会赤裸裸的威胁。

但是，政治神学不仅仅挑战自由民主社会，里拉似乎只注意到西方历史，而对其他文明视若不见。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在《中国的千年王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过程中的弥勒信仰与净土信仰，也构成了某种“政治弥赛亚主义”。假如这个论断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过头来考虑，这种渴求“净土”与“末世”的冲动，为何会不断发生，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政治神学传统”的文明，也会以相似的方式不断重演？这当真是像里拉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与启示宗教没有足够区分所带来的恶果吗？抑或是，这二者本身就无法分割，也不能分割？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沃格林会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政治与宗教不应分离，也不能分离，人的灵魂有序化问题不仅仅涉及宗教，也涉及到政治秩序的构建，近代的极权主义运动所具备的弥赛亚性格，并不仅仅是启示宗教的问题，而是人在驱逐上帝后自我僭称的结果，要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症候，自由主义认为要将政治与宗教分离，而沃格林却期待于灵魂的有序化。里拉看到“大分离”尚未完成，而且想让这个分离运动更为激进地向前推进，至少是要对政治神学保持高度的警觉性；而沃格林并没有最终回答“好社会是否可能存在”这一关键问题，他相信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却看到人性在追逐超越性过程中危机重重，时而脱轨，时而彷徨，由此产生了各种混乱与无序的政治秩序。但是，他并不认为“大分离”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他而言，人类意识始终充满着难以揣度的神秘性，而正是这种神秘性，也让政治秩序的建构充满了风险，马克•里拉洞察到了这种风险，但他却最终指引了一条问题重重的道路。

［美］马克•里拉：《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萧易译，新星出版社，2010 年 2 月，33 元。

图 1 为马克•里拉；图 3 为沃格林

洞悉真相的围观群众

特约撰稿人 贾葭（北京， jiajia80@gmail.com）

中国人似乎都喜欢对外国人说一口流利中文而欣喜不已，这种文化上的满足感，多半来自于深层次的不自信，似乎会说中文、娶一个中国太太、甚至有个中国养女，都是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不论到哪里，都喜欢带着他的中国养女，开场白都用中文。这并不奇怪，此前的美国驻华大使在未赴任之前，都已是华府外交圈的中国通。这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任命驻华大使的默规。民国时代，美国派驻中国的外交官，多具备传教士背景，或出生于中国，比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这种任命模式只在中国出现，美国绝不会派出生于日本的美国人做驻日大使。

早前的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Jr.）出生于山西汾阳，其父是公理会传教士恒慕义（A.W.Hummel）。李洁明（James lilley）之父则是长年在华石油商人，出生于青岛的李洁明，对中国更为熟稔。而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夫人，就是长篇小说《春月》的作者、华裔女作家包柏漪。

李洁明去年年底病逝之时，美国外交界曾有人士惊呼，“最后一个中国通走了。”李洁明 1991 年离任，接替他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也是传教士之子，生于南京。1995 年芮效俭离任后，美国再也没有派出中国通驻华。恒安石、李洁明这些老一辈的外交家，其对华交往更注重文化层次的切入，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两任驻华大使却更偏重经贸及战略角度，这似乎能说明美国对华外交的思路转变。

李洁明无疑是最为传奇的一位中国通。这位曾被希拉里誉为“最佳外交官”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情报界及外交界的传奇人物，参与了中美外交的初期工作，在1990年前后担任驻华大使。早年，他却是中情局的特工，相继在中国外围的六个邻近国家和地区履职，负责对华情报之采集分析。

从李氏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思维的嬗变.尤其是台湾问题，他以美国视角，解释了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何以建立。海峡两岸对李氏的评价近乎对立，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他就是“一小撮螳臂当车的反华势力”，但在李氏过世之际，大陆仍然给予他相当程度之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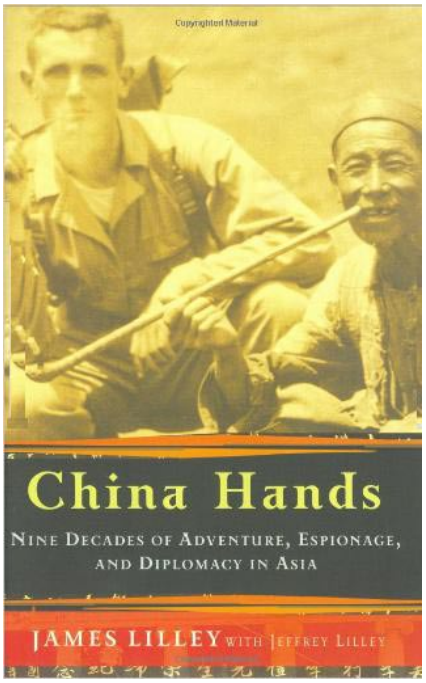
李氏幼年即目睹中国抗日之艰难。虽身在青岛租界，他仍对颠沛流离的中国百姓抱以极大同情。当时李氏对中国国力之羸弱颇为担忧，在他的记忆里，淞沪保卫战中，中国飞行员欠缺经验，数以百计的老百姓无辜丧生。

中国空军之作战能力，早在一·二八事件中就被质疑。涵芬楼大火之起因，坊间有多种不同说法。有人说系日本浪人放火（见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亦有人称系国军误炸所致，数万册善本书，毁于一旦。据云当时刚刚整理出一套《旧五代史》，经此一役，又花了好几年（见郑逸梅《清娱漫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不过张元济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抨击国府之无能，则事无可疑，丁文江曾在胡适处见到此信，“皆颇对于当局有不满意之表示。”

到抗战后期，李氏对于国军亦不具信心。他的哥哥法兰克1945年的家书中曾提及，“士兵又病又穷、衣不蔽体；基于上述原因，即使配备我们的装备，也无法作战。权力、金钱和教育都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病根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医疗、宗教和教育各方面。”表现在战场上，即是士兵作战能力低下。

这一点，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里曾提到。中国部队后勤供给系统极为薄弱，比如只知道进口坦克，却不知道应架设能够承担坦克重量之桥梁，以致有相当数量之桥梁被压塌。李氏之兄当年服役于昆明，对于国军内部之腐败知之甚详。比如军官驾车载着妓女四处饮酒，以致法兰克的美国同僚们，要控制国军军官对汽车之支配权。

抗战胜利后，李洁明回美国读书。事后他总结道，“中国内战的种子种在日本战败的土壤中。日本在东北的重工业基础，被认为是战后中国复兴经济的关键。”国共双方争取控制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历次谈判的重要问题（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是李洁明探究中国政治演进的开始。



对于中国大陆的正式研究，李洁明是从中国外围着手的。韩战爆发时，李洁明受耶鲁大学饶大卫（David N. Rowe）的影响，研修《中国与世界列强》课程，对红色中国的研究兴致颇高。后来他受另一位教授的号召，加入中情局，李洁明没有提及这位教授的名字，想必是藏身于耶鲁的隐身特工。1949年6月，李洁明在中情局受训时，解放军进入青岛，他不禁感叹道，“（这）可谓国民政府灵柩上的最后一根钉子，因为青岛是中央政府最后一个港埠。”

先前，中情局和国务院都预测，中共会在1950年底占领台湾。北韩部队在冲破三八线的两天之前，国务卿艾奇逊还在重申，台湾不在美国的亚洲安全半径之内。韩战爆发后，政策丕变。中情局针对中共的秘密作业也重新开始，台湾成为主要基地。

中情局对中国大陆的情报活动出师不利。1952年，中情局9人空降到东北，落地被擒。其中一人招供后，中方透过无线电给汉城的中情局情报站，要求美国派飞机来接，李洁明的同事唐尼、费裘还有两位飞行员飞赴中国大陆。飞机行将降落之际，被解放军击落。飞行员殉难，唐尼和费裘被抓。

唐尼被判无期徒刑，被称为“全体美国俘虏中的头号大坏人”被四处游行示众，费裘被判20年有期徒刑。直到1973年3月中美接触后，才放出来。唐尼在狱中看了六遍《战争与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选集》，他后来考入哈佛法学院，娶了一位沈阳妻子。这位康乃迪克州的法官没有他的同事李洁明那样的好运气，因为他在被放出来两个月后，李洁明光明正大的从深圳罗湖进入红色中国。

这个时候的李洁明，已经先后在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香港等地做了二十多年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全球冷战态势方殷，他在外围通过各种渠道观察和分析中国事务。冷战让全球分为两大阵营，海外华人也都因此站队。比如菲律宾的华侨社会由两大家族控制，杨氏家族亲台，而薛氏家族亲中。李洁明尽量通过从中国出来的人嘴里打探消息。

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金边，美国大使馆人员都去楼顶拍照片，这是他们获得情报的原始途径——在很多情况下，情

报就是公开信息。西哈努克把亲台的华人领袖全部禁闭起来。为了震慑反对运动，西哈努克手下把一个心智障碍、五官残废的男子拖到街头公开处决，声称他要谋杀刘少奇。

当时中国通过柬埔寨，支援军火给南越。柬埔寨武装领导人龙诺亲自督运。军火运输在高峰期时，龙诺曾是北京最为宠信的人，他的桌上还摆有毛主席肖像。不过龙诺反对越南人侵占柬埔寨，曾呼吁中方协助，将越南人赶走。而北京认为北越反对美帝，中方应该支持。龙诺后来对中方渐生不满，与柬埔寨第一副总理马它克联手，于 1970 年 3 月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

直至调任香港，他才觉得离中国更近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广东和香港之间的往来依然密切，尤其是难民，源源不断偷渡过来。李洁明接近这些人，通过访谈得知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进展。他甚至想跟新华社香港分社、华润公司等中方机构往来。不过港英政府还是禁止他公开采集情报。

在香港工作的成就，李洁明颇为得意，他引用周恩来的一个批示来肯定中情局香港站的成就："欲知中国事，可问中情局香港站"。中情局香港站陆续呈送华府的报告，后来被汇编为《马可波罗文件》。这个文件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极为知名，它是截止当时为止，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客观也是最深入的报告。

之所以取名为"马可波罗文件"，就是因为马可波罗虽然对中国有过详细描绘，但他从未真正涉足中国。这与中情局香港站、李洁明本人的"望陆兴叹"是有共同特征的。这是当时中情局最为无奈之处，他们始终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讯息。1950 年代的中国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外围的华侨大部分又亲台，情报工作不算顺利。因此中情局始终未曾发展出在中国大陆可靠的谍报网络。

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建立，李洁明以联络处职员的身份进入中国，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情报官，直接对基辛格负责，试图建立白宫与中南海的沟通管道。这种秘密外交，是基辛格外交的一大特色（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 年）。当然，他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任务。在当时条件下，他只能依照"克里姆林宫学"对中国政治动态做出分析。

这种分析跟今日中国的时政记者们分析政情之手段并无二致。比如观察人民大会堂的汽车数量，来判断这次会议的重要程度及参与人员。根据外宾的座席位置和名单顺序，确定中国外交部对待各国的态度。1973 年国庆节，布鲁斯大使跟苏联代表的名字殿后，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三国关系。

直到 1975 年《华盛顿邮报》抖出李洁明是情报人员后，他才被迫离开中国。在华期间，他建议中情局长老布什跟中国合作，在新疆建立情报站，观察苏联军事动态。这件事李洁明并未明说，直到 2008 年 5 月拜登与奥巴马搭档参选之时，《华盛顿邮报》才抛出重磅报道，解密当时中美在新疆的情报运作状况，正是拜登与邓小平当时决定的。

李洁明 1979 年 1 月从中情局退休，这时候他才 51 岁，按说不到退休年龄，可是布什卸任局长后，李洁明在中情局多少像个异类。1979 年 2 月 3 日，邓小平和布什在美国会谈时，李洁明在座。邓表示，（中美）必须坚持反苏路线。当时中国支持柬埔寨打越南，布什也表示支持中国打越南。2 月 17 日，解放军就开始进攻越南。李洁明随后加入布什竞选总统的班子，为布什的对华政策运筹帷幄。

1982 年 1 月，李洁明被任命为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主任。这个名义上非官方的职位相当于驻外使节。他一上任就遇到"八一七公报"的风波。国会里支持台湾的声浪巨大，此时里根内阁的国务卿海格态度亲中，释放出停止对台军售的气氛。李洁明立即面临台北传来的巨大压力。他的大学同学、台湾"外交部政次"钱复，曾经当面指责他、进而抨击美国对台湾不负责。

其实在早前一次与邓小平的会面中，邓曾经对李洁明说："我们会尝试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也不愿绑住另一只手，你能劝台湾跟我们谈判吗？"随后李洁明试图向蒋经国说明，美国无意抛弃台湾，但美国也需要与中国大陆敦睦。"八一七公报"签署后，里根口述一份总统指令，决定了此后美国对台军售的原则。

蒋经国静静地听完李洁明的叙述，向李说明了自己对台湾未来的规划。这就是蒋经国政治改革最早的腹案版本：民主化，本土化，繁荣经济，对大陆开放。1983 年 6 月，蒋经国流放王昇去巴拉圭做"大使"，扫除他身后强人政治之障碍。即便如此，江南案还是发生了。李氏此时开始与邱连辉、周清玉等党外人士接触，了解台独意识形态的来源。他也建议国民党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李洁明 1989 年 5 月调任驻华大使，作为布什的好友，这一任命让他颇感兴奋。他 5 月 2 日到达北京，当时北京内城的交通已经陷于瘫痪。李洁明此前在驻韩大使任上，成功斡旋全斗焕与异见领袖金大中的矛盾，避免了汉城的戒严危机，因此他刚来北京尚抱有相当信心。后来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李洁明将方励之夫妇隐匿在驻华使馆里长达 13 个月，引发中方不满，中美关系阴霾不断。于是布什又派出芮效俭接替他。李氏回国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

过去的 70 年中，李氏是亚洲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勾勒出一幅亚洲政治变迁的巨大图卷。李氏对中国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他的一生也与中国密不可分。这种感性因子让李洁明最后一次在华的外交工作显得较为痛苦。这个他观察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以一种他从未预知的模式，与美国对抗而又合作。

他最后说，“中国既难以捉摸，又骄傲自豪，既备受折磨，又楚楚动人。它正努力现代化，雄心勃勃、冲劲十足、贪婪饥渴，也渴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可它对世界却是又爱又恨，兼而有之。”

《李洁明回忆录》，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2004 年 2 月。

LIVESPOT 现场

合金般的德国之声——谈法兰克福广播乐团上海音乐会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这次来上海演出的五六支乐队，内心最为期待的其实就是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一是因为曲目口味重（布鲁克纳第六，原定的舒伯特第五换成了后宫诱逃选段与莫扎特的 38 号交响曲），而且也已有经验证实，英国爱乐美矣，但是明丽的音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听觉，BBC 交响则是我听过的最差国外名团，而费城乐团则是个无主游魂，这次上演的曲目也只在音色上入手，票房博彩动机强烈，加之票价贵，于是果断放弃，后也未见上海媒体报导这场演出，不知道效果如何；另外则是因为最近几年声名鹊起的小雅尔维让人很是期待，到底看这位亚美尼亚裔美国人遭遇到一支地道的德国乐团，会产生何等的化学效应。

当晚一出地铁，就感觉票房令人担忧，因为往常黄牛一般都会叫嚷着回收票，当天却是急吼吼地兜售打折票，进场后果然发现，上座率还不如 BBC 交响乐团演出时，或许是法兰克福的名气不够？或许是布鲁克纳这样生僻的作品令人畏惧？上海的演出市场时常让人困惑，尽管乐迷绝对数量不少，但是想想如昨夜这样的乐团来访，居然上座率只有七成不到，未免也间接反映了上海文化生活的某种生态吧，尤其下半场演奏布鲁克纳时，还有不少人退场，这也是比较令人惊讶的现象。

到开演前，才发现曲目临时又有变动，原定上半场的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序曲改成 Weber 的尤利安特序曲，后者少在国内演出场合演奏，其实是一首极有可听性的曲目，更让我感到兴奋的则是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所展示出来的气势与合金般的音色，这是典型的德国之声，也让我顿时对下半场的布鲁克纳有深深的期待。

上半场莫扎特的第 38 号布拉格交响，归属于莫扎特晚期六首最重要的交响作品之列，而也就是这六首曲目，让大家看到一个不大一样的莫扎特，关于这一点，音乐学家对其曲式和风格有大量的分析，不在我的能力范围，故不多述，但是莫扎特的最后几首交响作品，宏大与庄严之意已经十分明显，甚至里面你很少能感受那种如沐春风的体验，而是一个更为宽广的旋律气场与声响织体，就像开场那段优美与庄严交织的乐句，就很是让人觉得构思巧妙，莫扎特的庄严感准确而言，应是一种宏大，而不是严肃与冷峻，这从他大量运用抒情乐句过渡可证明。

从演奏角度看，这首曲子其实将这支乐团的优缺点都同时展现出来，从指挥角度，小雅尔维显然属于刚毅果断性，给出的指挥手势绝对是准确与标准的，而且他调教下的乐团纪律性极其严格，音色的控制也非常严苛，乐句的结束音绝对是干净

利落，不留一点余音回响，这或许也和小雅尔维追求对比度的一个指挥特色，但同时造成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渐弱”与“渐强”的效果都不复存在，让音乐的整体性效果有所折扣，我为了比较，我还专门找到 Bohm 的几张专辑听，Bohm 的诠释显然在过渡性上更为顺滑流畅，而且在齐奏部份也是刚进十足，丝毫不弱。而且小雅尔维指挥时，身体不时的在有节奏的抖动，一顿一顿的，我于是开始猜想，这或许是小雅尔维对节奏的对比度十分强调的旁证吧。

到下半场，布鲁克纳第六正式登场。在第一乐章，法兰克福的那种德国合金般的冷峻音色开始发挥，而且第一乐章中见插的双簧管独奏与齐奏的大对比度，显然是小雅尔维所擅长的，布鲁克纳对静谧与宏伟声响之间的对比，绝无浪漫主义那绵绵不绝的依恋感，因此乐团的表现也比上半场更为出彩。尤其是弦乐齐奏上，从上往下俯瞰，甚为壮观，视觉上也是一大享受。不过说到发挥，昨夜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第二乐章柔板，这也让我看到，法兰克福并不是一支大开大合的乐队而已，在细部的表现上也还是有一定的独到功力，而且双簧管首席的独奏，绝对是催人泪下，这哪像是布鲁克纳，完全化为了绕指柔！乐团在这个柔板乐章的表现绝对是丰富且具张力的，因为那种感人效果扑面而来，但是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所阐发出来的这种感人，是通过对音色与节奏的综合运用来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同于“滥情”的感动，而更像是“铁汉柔情”般的体验。不过这个乐章，小雅尔维还没处理到极致，远不如切利比达克将乐句拉长到极慢时所呈现的那种动人甚至悲凉感，在小雅尔维这里是看不到的，而且这种体验也是时隐时现的，并未形成整体性的音乐效果。

相比上次来访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个人感觉，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的弦乐部份虽然极有气势，能量也很劲道，但是大中小低音弦乐部份之间的区隔还不够明显，尤其在构造一些最底色的音场气氛时，低音部份就无法凸显出来，反倒是管乐部份十分抢眼，导致我的情绪是一路向上飚，反倒是沉不下去，这也使得布鲁克纳的某些特色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我不知道坐在 A 区正面会有什么不同的体验，但是就我的位置上，管乐相对弦乐而言，还是有一些风头过劲的感受，不知是否是位置问题。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是迄今为止来沪演出最让人兴奋的乐队，不仅抛弃了一般乐团来华访问只求票房而选择大路曲目的商业套路，而且演出也相当认真卖力，其敬业态度令人深深感动，更关键的是，这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德国之声，在这里，我们分明可以洞悉到昔日德奥音乐的光辉余色。

图 1 为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指挥 Paavo Järvi

观察 OBSERVATION

富士康与中国模式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 wway1980@hotmail.com）

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富士康接二连三地发生跳楼事件。只有短短 5 个月时间，跳楼者的数字已经达到了 11 个，其中 9 人死亡，两人重伤。[1]这 5 个月中，我正在重读哈耶克、波普尔和阿马蒂亚·森的著作，真希望他们能帮我更好地理解，是什么让富士康的工人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都那么年轻，而自杀的方式如此惨烈，令人触目惊心。

哈耶克、波普尔和森以洞察自己生活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现象著称，不止一位朋友反复引用、介绍和推举过他们的观点。但回到中国当下的生活，判断自杀现象的时候，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裂缝。这条裂缝比想象中大得多。

分歧在于：把那些年轻的工人送上绝路的，是富士康的管理方式，还是更加隐秘、甚至无从索解的个人原因；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这些工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否负有责任，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分歧的起因则是我的一篇短文：

第八起员工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从五台山请来和尚，举行了祈福法会。但接下来是第九起和第十起。很多人开始问：郭台铭在哪里？

[1]两天后，我不得不更新这个数字。就在 2010 年 5 月 26 号深夜，第 12 名富士康工人跳楼身亡。另有一人割腕自杀未遂。

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和媒体不知道郭台铭在哪里。有报道说，今年他将迎来第二个孩子。他应该会陪伴怀孕的妻子，憧憬新生命诞生的欢喜。

那些从富士康的宿舍楼上跳下去的年轻生命，同样给这个世界带来过憧憬和欢喜。但这一切提前划上了句号，还把“代工之王”卷入了危机。

不过，真的是危机吗？为富士康辩护的人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跳楼事件，也都不忘先否认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他们的理由不难理解。和其他企业相比，富士康为员工提供了更正规的合同、更高的报酬、更好的福利，年轻人仍然聚集在富士康工厂的门口，等待加入这家公司。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遍布中国的代工企业，哪一家敢说自己不是呢？

最潮的电子产品：Iphone、Ipad、惠普的电脑、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手机，源源不断地从富士康的工厂运向世界。2008年出口额达55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3.9%——没有半军事化的管理、令人崩溃的高强度劳动、以加班工资为主要来源的收入结构，没有统统这些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之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何而来？那些辉煌的数字从何而来？印度的人力资源同样丰富，却没有“代工之王”，秘密之一不就在这里吗？

尽管业绩辉煌，郭台铭向来都很低调，“十连跳”没改变这个习惯。5月24日，他第一次回应事件，语言俭省到了极点：“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他说，“我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况稳住”。人们也希望如此，但现实无视他们的意愿。悲剧继续在上演。25日，“第十一跳”发生了。

有人给郭台铭写信，鼓励他顶住压力，把富士康的经营管理之道坚持下去。“作为您在华人电子业界千万粉丝的一员”，写信的人说，“我希望您不要过于忧伤和担心，因为大家相信一切总会过去。”

接下来，他道出了很多人真正的想法：“讲求纪律、内部竞争、控制成本其实也正是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华人企业可以迅速崛起于世界的制胜法宝，如果放弃，等于自废武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的例子是电影《2012》：政客和富豪们乘坐的方舟，正是“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中国人制造的。

科幻电影中的世界并不虚幻，而是反映了现实中真实和深刻的偏见。如果真有世界末日，当然，只有中国工人能够按时交出代加工的产品，但不是因为他们“吃苦耐劳、严守纪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世界末日要到来。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在等着发加班工资吧。

经济学家为富士康所作的辩护看上去严正得多。身逢全球化，一个劳动力富裕而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是发展经济的必经阶段和不二之选。企业家——包括他们为压低报价和提高竞争力而创造出的企业管理学，仅仅是遵循了客观规律。

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环境污染、工伤和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让人伤感，但不可避免，这有统计学上的现成解释予以支持。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早些时候已经出台，5个多月10人跳楼没有异常之处，“富士康员工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力巨大的张五常教授反对《劳动合同法》过于呆板的规定，反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甚至反对最低工资，我都表示过（程度不一的）赞同，因为那限制了雇主的自由，会减少就业机会。他常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证明穷人需要的恰恰是机会，而不是最低工资。

但教授还反对工会，却不反对政府以企业的身份，和其他企业进行交易。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和暴力机器，通过征地，通过曲解和漠视法律，也通过压制工人的维权活动，换取GDP数据和税收。张教授假装不知道，正是这种交易，剥夺了穷人选择和谈判的权利。

如果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选择题：A：富士康（带着它全部的“血汗”属性）；B：其他代工企业（报酬更低、合同更不规范、福利更少）。你的机会在哪里？教授假装不知道。

这些霸道的选择题存在已久，抹杀了一切像张教授和他幸运的弟子们那样改变命运的可能，让年轻一代备感绝望。在富士康的高墙内外，这样的绝望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送上了绝路。

木心评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说过这样的故事：

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

“你打算到哪里去？”

“哪儿都行”。

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

“自己挑吧！”

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郭台铭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并没有别的地球仪。在危机逐渐酝酿的五个多月里，郭台铭一直以中国特有的沉默面对危机。[2]富士康限制记者进入它规模庞大的厂区，也不让外界了解事件处理的细节。郭台铭似乎笃信：保密将消磨外界的好奇心，而时间会让人们忘记一切。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代工制度的一部分。

富士康的成长壮大如同神话。1974 年，郭台铭办了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调频旋钮的小电子厂，启动资金只有 7500 美元，是向母亲借来的。1988 年，他才第一次在大陆设厂，谁能想象，20 年后富士康的出口会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 3.9%？

富士康的增长速度和方式，简直是“中国模式”的缩影。从没人怀疑它们的成功，直到这一回，一个接一个的年轻人从富士康的宿舍楼上跳了下去。

富士康的工资和福利公认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富士康的园区里，从娱乐、健身、后勤设施一应俱全，堪称模范企业。但要像阿马蒂亚·森那样，“用自由（而不仅仅是收入）看待发展”，这个模范企业，就不算那么模范了。2010 年第一起自杀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员工因为丢了一台 IPHONE 样机。他为什么选择跳楼自杀，是什么情况下自杀的？背后的细节从来没有公布过。

已知的事实是富士康森严的等级制度；领班动辄对工人恶语相加；保安不仅可以对员工盘查、搜身，还可以拘禁，甚至殴打。媒体报道说，这些保安由郭台铭的一位副手亲自管理，是富士康实施“半军事化管理”的核心力量。

如果说这些保安是准军队性质的私人武装，那富士康园区就堪称一个小国家。在富士康园区，如果你拨打报警电话 110，电话不会接入到警察局——还是直接转到内部保安的电话上。

但正如郭台铭在哪里并不重要，富士康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富士康这个封闭的小世界，只是一个更坚固完整的大世界的缩影。权力保障着纪律，个人为集体牺牲，让桀骜不驯的人变得驯服，这个世界是波普尔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的反面教材，接近哈耶克描述的奴役之路，因此，决不能用森的尺度来衡量。

哈耶克去世 18 年、波普尔去世 16 年后，他们的重要作品大多翻译成了中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钦佩他们的批判意识，服膺他们的判断（许多已经被历史所证实），认同他们对人类行为所作的分析和预言。但总的说来，张五常教授代表的经济学理论更加流行。

这种学说也反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但不反对政府和企业做生意。在中国，最重要的生意是招商引资。政府变身为企业，以公权力（征地；拆迁；贷款担保；税收、环保和劳动保障方面的折扣）交换 GDP 数据和税收。不仅如此，为了争取投资者，政府之间还会互相竞争。张五常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政府为争取投资而进行的竞争，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原因。

虽然命名为“县竞争制度”，其实不限于县。省和省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样适用这套解释。“比较优势”理论，就是对国家层面的竞争的描述。

不管是“县竞争制度”还是“比较优势”理论，对待政府权力的看法，与哈耶克和波普尔有根本的不同。前者只着眼于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成为市场机制的一部分，所以倾向于权力集中（权力越集中，效率越高），却不考虑这种制度安排

[2] 5 月 26 日，富士康终于允许部分媒体进入厂区参观采访。

的负面作用，也即政府与政府竞争之余，还会动用强权与民争利。

关于中国政府与民争利的报告非常多。其中大多数事实可以证实，不对等的竞争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利润，妨碍中国经济发挥活力和创造力，并且在分配制度上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为争取投资而进行的竞争中，地方政府基本无视本地居民的利益。为获取土地，政府主导了征地和拆迁，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的和平时期绝对是空前的，却很少给予充分合理的补偿。迫使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就范的方法，往往是暴力。这只是 GDP 增长与本地居民的利益相冲突的例子之一。另一个普遍和极端的例子是环境污染。污染导致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重视和治理。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官民冲突。但真正紧迫的事情是政府在主导经济的过程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形成了行政权力独大的政治格局。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如同漩涡，拖垮了权力衡机制。公检法、武警、军队和媒体统统为行政机构所用。任何可能动摇行政权力独大这一局面的事态，都可能被冠以“不稳定因素”的帽子，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维稳”已经花掉了纳税人很多钱，还会消耗更多的财政资金。这些钱本应该用于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现在却用来监控他们的言行。可见，“中国模式”虽然能够快速拉升 GDP，提高国民收入，但成本并不低廉。

“中国模式”提升国民收入的能力会随着时间推移递减，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农民第一次成为工人，收入会明显增加，但此后增长率就低于 GDP 增幅，甚至停滞不前（黄亚生，2009）。

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这种看法通常是正确的。但富士康乃至整个代工业的工资水平，真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吗？工会是一个可供观察的指标。在富士康陷入危机的时候，日本本田在中国的汽车组装厂全部宣告停产，原因是佛山的变速器生产厂发生了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待遇。为防止遭到报复，罢工工人面戴口罩，也不愿推选谈判代表，但在他们提出的六项要求中，有一项是“重整工会”。现有的工会得不到工人的信任，也很少在维护工人权益上有所作为。[3]虚弱的、带有官方色彩的工会掌控在资方手中。这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工会的虚弱正是由于其官方色彩决定的。其结果是工人的工资增长期无法提升。

20 年来，中国 GDP 规模从世界第十一上升到世界第三，逼近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23 倍多。[4]但和第一代民工的收入相比，第二代民工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增长。与此同时，贫富分化明显，中国出现了非常高的基尼系数。[5]这两个背离是政府利用垄断资源（土地、资金、暴力机器）与民争利的结果，值得高度重视。

工资增长的停滞状态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会消磨一个社会的活力，造成无力改变命运的无望情绪。驱使富士康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从高高的楼房上一跃而下的原因里， 这种无望情绪起了多大作用？[6]

“县竞争制度”必然把经济增长的原因解释为不受制衡的行政权力。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为行政权力扩张输送合法性。这个循环即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既超过 GDP 增速，又超过国民收入增速的原因。

如果现状得不到校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政府与民争利的严重后果可能抵消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疾风暴雨式的再分配，也许会导致经济活动的成本无限升高。因此，如何防止政府与民争利，成了急需做出“经济解释”的问题。但张五常教授用一个轻巧的“县长动力假说”，轻轻绕开了这个话题。

“县长动力假说”来自一位赴香港招商时前去看望教授，并向他讨一杯葡萄酒喝的县长：

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中国的县长不会有私心，政府权力不可能滥用，所以才能成就那个著名的嘉许（“县竞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对人性的假设与哈耶克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去甚远，导致他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知背道而驰。

[3]富士康国际 2009 年财报显示，富士康员工数量相比 2008 年增加了 9.7%，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 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 34%。

[4]中国 1990 年财政收入 2937.10 亿元，2009 年为 68477 亿元。

[5]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5。

[6]可能引起自杀的原因几乎无法穷尽，为富士康辩护的人常说，个人心理因素应该对自杀负主要责任。但他们同时又否认外界环境、工作状况会对个人心理造成负面影响。真正惊讶的是，有人认为，中国人可能饿死、累死，但绝不会因为饥饿和劳累就去自杀。除非他们是软弱的知识分子。这就把秦晖教授批评的“低人权优势”进一步发展到了“低等人类优势”。是啊，中国人既然能忍受“文革”，为什么不能忍受在富士康上班？也许富士康的员工并没有自杀，只是被外星人劫持了。

但张教授对人性的看法是矛盾的。他假设“县长无私”时无比乐观，相比之下，对工会分子的人性毫无信心。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工会，因为工会让雇主和本分工人都失去选择自由，到头来只有“搞事的”人获益。通过“搞事”谋取私利的人，为何只会出现在工会，而不会出现在政府？他无从解释，结果是削弱了自己的说服力。

主张工会的人，不见得认为工会是完美的，或者工会分子完全无私。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府（无私的官员），没有完美的公司（无私的老板），哪里会有完美的工会（无私的工会分子）？问题是政府和资方需要制衡。洛克把政府看作“必要的恶”。只是因为同样的逻辑，工会是必要的，因为其他制衡权力的手段，到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

保持对任何一种“最好制度”的警惕，保持对任何一种“无私的”人类的怀疑，以及对权力的监督——尤其是它明确显示出不允许监督的苗头的时候，是哈耶克和波普尔留下的重要遗产。如果这个遗产值得重申，我们就应该坚持认为，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人性，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权力。当权力牢牢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不受监督，毫无疑问将助长官员谋取私利的动机，反过来促使他们进一步逃避监督。这种机制乃是极权制度的根基。

极权体制虽然早在 1970 年代末就难以为系，但支撑这种体系的大多数因素并没有消失。它们被包含到最近 20 年里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体系当中。像 “混合所有制”一样，兼有极权因素和自由市场成分的新系统也有混合的特点。这种混合体系有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面，也有诸多负面影响。

为这种混合体系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最有力的辩护，并不是官方那些意识形态化的、干巴巴的训诫，而是上面提到的经济学主张：一群无私的官员掌握着世界上最集中有效的政府权力，用于征地、拆迁、压制工人维权活动，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才成就了“最好的制度”。这种有意无意的天真，非常投合从膨胀的权力中捞足好处的官员的胃口。

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对理论的极端运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发现其中的危险。曾经在山西洪洞县上演过的现代奴隶制（是的，刚刚又在河北衡水发现了），之所以被唾弃，并非因为“黑砖窑”效率低下，而是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无法承受那种断裂：一部分人在经济发达的城市里享受现代文明，另一部分人却在鞭子下带着脚镣劳动。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伦理上的挑战。长期而言，我们总有一天要在这个层面上，重新审视富士康和“中国制造”的意义。

在此之前，可以顺便说一句，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允许全世界县级以上官员投票，张五常教授一定是票数最高的得主。不光因为他在中国官员中最受欢迎，也因为中国官员的人数最多。

ART 艺术

英国的波普艺术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如果硬做一个勉强类比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正如欧洲的通货分欧元和英镑一样，欧洲的艺术也分欧陆艺术和英国艺术。两者虽有流通（融合），但大别判然，殊难“一勺烩”。一方面是地理环境上与欧陆的隔绝，虽然远离兵燹战劫，却也使对外文化交流受到抑制，形成了相对因循保守、怀旧古板的民族性格，即所谓“岛国意识”（Island Mentality）；另一方面，文学传统过于强大，甚至艺术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叙事，毋宁死”，长久以来成了英国绘画艺术近乎偏执的美学恪守，乃至欧洲画坛在经历波澜壮阔的印象主义（包括新印象主义和后期印象主义）革命洗礼的时候，英国艺术却在维多利亚时期理想主义学院风格的死胡同中徘徊。其结果，便是 20 世纪以前，英国艺术发展完全与欧陆脱节，几乎被主流无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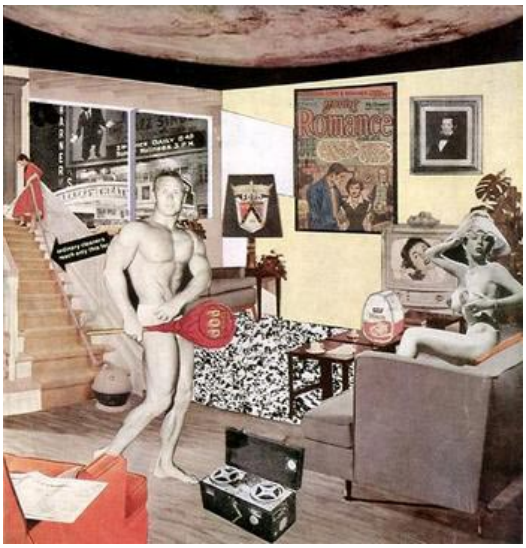
现代主义潮流，对英国艺术不啻一剂猛药。尽管顽强的叙事传统在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又有过几次“回光返照”式的回潮，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英国艺术开始“国际化”，逐渐与欧陆艺术潮流合流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乃至战后，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伦敦画派”，虽然在规模和对前卫艺术运动的影响上，无法跟 20 世纪之初活跃于塞纳左岸蒙巴纳斯的“巴黎画派”相提并论，但却贡献了诸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吕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等享誉国际画坛的重量级艺术家，并对后现代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至此，连法国和美国也不得不对英国艺术刮目相看。而作为前卫艺术运动，

真正发出巨大动静、令世人为之侧目的，应该说是英国的波普艺术。这场滥觞自英伦、做大于美国的前卫浪潮，终结了现代主义，并深深链接到后现代艺术的发生机制中，乃至对后发的、欧美之外的艺术运动也起了“酵母”的作用：譬如对 70 年代日本的前卫艺术运动及时间上更靠后，影响似乎也更大的中国“政治波普”，等等。

波普艺术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的伦敦。其后，火花溅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成为反映彼时政情文化与社会生态的艺术潮流。作为前卫运动，它并非基于某种理论预设或特定的纲领、宣言之上的一系列艺术行动，而是一种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得以迅速传播的、前所未有的流行文化现象。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无非是把大众文化中一些通俗的视觉表象作为现代绘画的主题，以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形式加以表现；或借助于战后消费社会特有的复制技术及影像生成技术手段，以某种类似达达主义的非艺术，甚至反艺术的形式拼接、合成。

今天很难想象圆珠笔、慢转密纹唱片、彩印时尚杂志刚问世时世人趋之若鹜的景象。当伦敦、纽约的中产阶级坐在客厅里，通过“摩托罗拉”或“德律风根”牌黑白电视机收看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想到后来的石油危机、战争和经济萧条。尤其对英国这样一个刚刚从战后初期定量配给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来说，好莱坞和美国大众娱乐电视节目所提供的讯息是如此激动人心，那种活色生香的诱惑是断然无法抗拒的。而这点也构成了英国波普与美国波普的一个超越单纯发生时间差的重要分野：与后者的艺术家们（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对身边工业文明制成品所抱有的近乎物理性的冷静观察态度所不同的是，英伦的艺术家们几乎是在亢奋中品味着美国产品，反复咀嚼，津津乐道。毕竟隔着大洋，美国货在彼岸艺术家的眼里，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浪漫，是未来的代名词，颇有种激起对儿时钟情的精美玩具的“乡愁”似的煽情功效。这种源于经济复兴所带来的自信的高枕无忧的乐观主义，自然成了艺术繁荣的土壤。正如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预言经济起飞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你从未感觉这样好”，好到即使作品的基调是挖苦、讽喻性的，也统统浸泡在“喜洋洋”的氛围中，隐而不见了。

波普本身即“Popular”，有大众、流行之意。顾名思义，波普艺术所表现的就是大众文化，流行趣味，套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化表达，就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艺术。因此，波普或波普艺术本来的语境，基本上是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并不带有奚落、批判的意味。早在 1954 年，英国批评家劳伦斯·阿洛威（Lawrence Alloway）在一篇题为《艺术与大众媒体》的文章中，用“波普艺术”（Pop Art）一词指称那些由广告文化所创造的“流行艺术”，诸如杂志上的商品广告，电影院里的海报、招贴，商店里的橱窗、商标等包装文化。60 年代初，该词被扩大到指在“纯艺术”（Fine Art）创作中使用商业流行符号的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继而发展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波普艺术”的标签。



1956 年，英国怀特夏佩尔（Whitechapel）画廊举办了一个展览，展览的名字充满了宣言、启示录的味道：《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展出了一件不同凡响的作品：《到底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非凡，如此有魅力？》（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正是这幅作品宣告了波普艺术的诞生，汉密尔顿本人，也成为波普艺术的“教父”：复式结构公寓的客厅里，肌肉发达、身材健美如古希腊雕塑的男主人做着健身运动的标准收势动作，单手握着的网球拍上写着“POP”的字样；同样半裸的美丽女主人坐在布艺沙发上，单手爱抚乳房，作陶醉状；天花板上贴着高空探测装置自动拍摄的地貌图片；地板上放着磁带式录音机，漂亮的女仆拉着吸尘器长长的管子正在为铺着地毯的楼梯吸尘；沙发旁边的电视机正播放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广告片；墙上装饰着一张放大的连环画报封面和一枚“福特”的徽章；窗外是一个电影屏幕，正放映着电影《爵士歌手》里艾尔·乔尔森的特写镜头。在这幅拼贴起来的招贴画中，艺术家调动、整合了两种后来为波普艺术家们所爱用不已的资源：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幅开山之作成了某种“行业标准”。

汉密尔顿曾经是新达达主义艺术家，杜尚的门徒，深受后者艺术哲学的影响，而且跟杜尚一样，人和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是波普艺术当仁不让的理论家。他在创作上述作品时，曾拉了一张单子，罗列了一些他认为作品应该涵盖的内容：男人、女人、食物、报纸、电影、家庭用品、汽车、喜剧、电视资料及流行杂志等。可以说，这张清单几乎囊括了波普艺术的全部核心要素。翌年，他在致建筑师朋友彼得·史密森的一封信中，枚举了波普艺术所应具备的所有品质：“通俗的（为大

众所涉及)、短暂的（短期的解决方法)、易耗的（容易被忘却的)、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年轻的（着眼于年轻人)、诙谐的、性感的、机巧的、有魅力的、大宗交易的。”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敏感的都市型艺术家，汉米尔顿敏锐地意识到都市通俗文化的潜力：“通俗艺术作为不同于美术的一个部分，今天并不存在。波普艺术在它今天的对等物是消费者的产物，它有众多的人口来消费，有巨大的娱乐机器来创造……其结果是高度的个性化和老练，但也有其健康的活力。”这已经高度逼近后来波普美国势力对波普艺术的定义，只不过后者来得更加直接、干脆。譬如，罗伊·利希滕斯坦认为：“把商业艺术的题材用于绘画就是波普艺术”；而沃霍尔索性希望“把自己变成机器”。

除了汉密尔顿外，英国波普艺术中，还有两位重要的艺术家，均为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是汉密尔顿的弟子辈，实际也上过他的课。其中一位是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布莱克与汉密尔顿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创作态度很少是学术性的，而多是怀旧式的；他对精心制作的过程不感兴趣，却对绘画各个组成部分的每个细节本身很留意。作为一个早年曾受过版画训练，对欧洲通俗艺术有相当了解的艺术家，布莱克有强烈的风格意识，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他对自己被看成波普画家这点始终不以为然，有某种拒斥，而宁愿说自己是一名具象派画家。这从其作品上也能看出来，他非常注重构图的均衡、完整。虽然他也常常将通俗明信片、钉在墙上的印刷品或流行明星的照片整合进作品中，但从来不会像汉密尔顿那样分解图像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诠释，而是保存其本来样态。布莱克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以童年回忆为题材的系列，如大孩子训斥小孩子，或两个孩子神情专注地盯着一张滑稽画报，画面中有某种张力，氛围紧张，令人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某些挫折时刻。

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更年轻、开始创作更晚，但名气也更大。如果把汉密米尔顿和布莱克从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创作活动看做是英国波普艺术第一阶段的话，那么 1961 年，一群年轻艺术家（主要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集体登场亮相的“年轻的同代人”展览则被看成是第二阶段的开端。实际上正是这次展览，向社会宣告了英国波普艺术的被发现，而霍克尼则是其主导者。

与波普艺术草创时期的前辈们所不同的是，包括霍尼克本人在内的这群艺术家，主要是画家，虽然他们并不拒绝拼贴，并偶尔为之，但绘画仍然是他们主要的表现手段。他们普遍意识到抽象绘画在 60 年代的发展，但主观上似乎更受布莱克的影响，更偏向具象绘画。这点使其创作与第一阶段波普有不小的距离，第二阶段艺术家们更强调绘画性。霍克尼本人在素描和肖像绘画上获得评价也与这种因素有关。他尤其擅长钢笔画，线条柔和、简洁，有种令人揪心的脆弱之美，对诗人 W.H. 奥登的钢笔素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霍尼克还很善于把一些非绘画性因素融于绘画作品中，如表演和涂鸦等，这后来也成为波普艺术家们的“惯技”。在 1961 年轰动一时的展览上，他预先张扬说皇家美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吊起观众的胃口。于是人们纷纷造访那里的艺术家工作室，看到底出了什么事。霍尼克挑选这个时机，突然透露他的“同志”行为：他开始在画布上涂抹说给男友听的私密话语。情急之下，那些字母和符号呈歪扭、失衡状，微妙地契合了作者彼时的“张皇失措”。这幅叫做《我们哥俩相信相爱》（We 2 Boys Together Clinging）的抽象作品的题目据说来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

波普艺术作为一种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社会的能动反应，所反映的清一色是与都市大众文化合拍的时尚、风俗和流行趣味。整个 60 年代，风景画几乎从人们的艺术趣味中淡出——人们不关心自然，只关心技术社会的“奇技淫巧”。百货店精致橱窗里的陈列或超级

市场货架上的物件，成了波普艺术家们灵感的源泉。因此，尽管一些波普艺术作品看上去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其出发点还是要讴歌、拥抱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美国艺术评论家露西·史密斯说："波普艺术是赞美性的。艺术家真的喜欢他们运用的材料。他们喜欢这些材料本身，也因为这些材料是他们享受的文化之象征：其速度、能量、色情和对于新的激情。"

从形式上来说，波普艺术家们摒弃了此前沉闷的学院风格，开始尝试以拼贴等非绘画性的手段来表现都市通俗文化中的题材，貌似有很强的"去精英化"特征。但就其作为前卫艺术的出发点而言，恰恰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精英姿态。这一点，从英国波普势力主流艺术家们清一色学院派的出身上，亦可见一斑。照美国现代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说法，"前卫"文化是对已经停滞不前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重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革命，因而是高级的精英文化形态。但同时它又是走向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与之相适应的是现代社会也在造就一种"后卫"文化，即庸俗的大众文化。格林伯格话语中的大众文化，主要指两种对象物，一是庸俗化了的学院派艺术，早已堕落为纯技术主义的、毫无"精气神"可言的精致画室技巧；二是现代都市所制造的商业性市民文化，如时尚杂志、流行歌曲、电视肥皂剧、商业广告，等等。

对前者，应该说波普艺术具有"免疫力"，因其原本就源自对抽象表现主义等架上绘画语言的绝望和反动，其成功也是抑制、摒弃纯绘画语言，尝试非绘画、超绘画表现形式的结果。但对后者，状况则不容乐观。因波普艺术作为"前卫"文化所借助的表现题材，与现代商业社会日复一日海量产出的"后卫"文化有相当的重合部分和同构性，两者很容易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在互相利用的同时相互消解。欧美社会的现状早已反证了这一点。作为在英美波普延长线上的波普"中国势力"（China Power）也难逃其"杯具"：随便进入位于上海新天地或北京的798、南锣鼓巷这类时尚地界的一家精品店，你都能看到拿"毛"（Mao）或工农兵大批判等政治波普符号来说事的T恤衫、咖啡杯和烟灰缸，被郑重其事地摆在货架上待销。那情景与在纽约看到玛丽莲·梦露被消费，在东京看到占领时期美军的军靴、背囊的仿制品被摆在原宿、表参道的精品店里毫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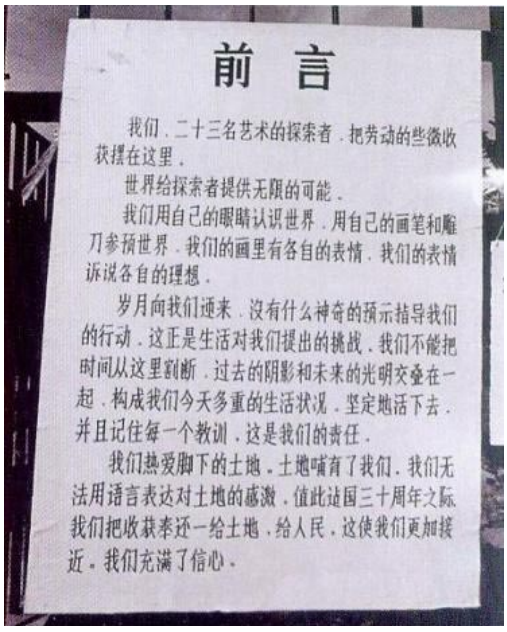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波普艺术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主义在理论上的终结。

图 1 为汉密尔顿作品《到底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非凡，如此有魅力？》；图 2 为彼得·布莱克作品《字母》； 图 3 为戴维·霍克尼作品《粘合》

没有民间，只有"被民间"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20 世纪，"民间"两次受到特殊礼遇：一次是 1919 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一次是 1942 年前后的整风运动。两次运动都对"民间"进行了高度评价，但内在精神迥异，前者是知识阶层发现民间，后者则是意识形态改造民间。


前 言

我们，二十三名艺术的探索者，把劳动的些微收获摆在这里，

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预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岁月向我们逶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预示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生活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把时间从这里割断，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热爱脚下的土地，土地喘育了我们，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土地的感激，值此建国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把收获奉还一给土地，给人民，这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充满了信心，

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阶层以民间对抗权力（胡适将古典文学称作"贵族的朝廷上的文学"，与其说他反对古典文学，不如说他是反对贵族和朝廷）；在整风运动中，伟大领袖以民间教育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从民间的伯乐变成民间的学徒，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是新的权威，因为民间和知识分子一样，必须接受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获得认可。

此后，"整风运动"而非"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起到绝对主导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种叫做"群众艺术"/"民间艺术"的东西成为唯一的艺术方式。但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民间，不如说是"被民间"。民间受到礼遇的程度，跟"被民间"的程度，常常成正比。

1979 年的第一届"星星画展"，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是民间？从身份上说，"星星画展"的起事者更接近群众，有的是无业游民，有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才是民间。但他们的艺术，却不是"群众艺术"，也不是"民间艺术"。

“星星画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被视为“星星之火”。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艺术风格，更在于展出方式。一些艺术爱好者，在公园里自发举办画展。这种模式不仅空前，亦称绝后。30 年后，“星星画展”的艺术风格不再新鲜，当年看来有些极端的表达现在看来已经有些保守。但是，像“星星画展”那样举办画展，现在看来依然过于前卫、过于超前。虽然各种双年展、三年展也会将公园当做展出空间，但是一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与自发形成、没有主办单位的“星星画展”不可同日而语。

1979 年，除了著名的“星星画展”，北京的“无名画会”、上海的“十二人画展”都是没有经过审批的自发组织的艺术展。这些画展只能出现在 1979 年，不是因为这一年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横空出世，而是因为在 1979 年的短暂时光里，公园等场所一度恢复了公共空间的属性，民间开始自我表达和自我呈现。

艺术需要在公共空间中呈现，这种公共空间可以是美术馆，也可以是公园、街道和广场。我们的公园、街道和广场，从来不缺乏艺术，尤其不缺乏“群众艺术”/“民间艺术”，但它们通常是被指定的艺术。被指定的艺术，是不是“群众艺术”/“民间艺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民间更加需要在公共空间里呈现。公共空间不仅是公众空间。一个空间，有很多公众，那只是公众空间。公众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主地散步、演讲或者举办画展，讨论公共问题，那才是公共空间。“星星画展”中的民间艺术家，没有发现民间，也没有改造民间，他们就是民间，他们证伪了“群众艺术”的群众性和“民间艺术”的民间性。

1979 年，在公共空间里，民间和艺术相会。随着 1979 年底“西单民主墙”的消失，公共空间名存实亡。时至今日，很多艺术家热衷于使用民间，比如搜集各种民间元素，征集群众演员，但是，基本没有跳出发现民间或者改造民间的两条路线。如果像新文化运动中的前辈一样致力于发现民间，依然值得期待，发现民间的工作远未完成。很多纪录片工作者，就在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可是，更多的艺术家习惯于改造民间，整风运动以意识形态的名义改造民间，他们则以艺术的名义改造民间，把民间当做原料，撒上艺术的味精。他们改造民间，加入自己的观念，以说明这是自己的作品，但是他们又告诉观众，这就是民间，他们知道民间的想象力超出了艺术的创造力。

民间只有在公共空间里才能自主发声，否则，没有民间，只有“被民间”。既然如此，是不是要坐等美术馆、公园、街道和广场恢复公共空间的属性？完全不必。网络虽然受到重重限制，但是依然具备了公共空间的属性。接续“星星画展”精神的艺术作品不在美术馆里，而是在网上，比如草泥马，我对它的喜爱远胜于那些庞大的恐龙或者孔雀——这只可爱的神兽告诉我们，民间和艺术的“第二次握手”已经开始，但它不在艺术家的控制范围里。可是，草泥马的发明者难道不是艺术家？

他们甚至放弃了署名权，完全回归到无功利的状态。他们不是民间的伯乐，也不是民间的学徒，他们是民间艺人。

但是，我更愿意放弃使用“民间”这个词。等到哪一天，公民、社会、公共空间成为现实，民间才会最终摆脱“被民间”的宿命，艺术才会呈现出完整的面相。

图 1 为星星画展前言；图 2 为西单民主墙

INTERVIEW 访谈

刘亮程：我们改变不了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 liufang0815@gmail.com）

村里打出了石油，井架比村里最高的水塔还高。村民们以为这下多少能分点钱，可听说石油上把钱都给了县上。县上花了几千万建了个广场，上面栽了很多高大柱子。又花了几百万在广场修了个大鼎，不知道要干啥。

按照村里人的想法，栽柱子一是拴驴，二是搭驴圈。大铁锅嘛，大概是煮羊肉的。据说有了石油之后县上的钱花不完，所以建一个一次可以煮一百只羊的大锅，每周末给全县人煮一锅羊肉，免费吃……

作家刘亮程在长篇小说《凿空》里描绘了这样的情形。自然，村民们的愿望后来落了空，他们发现不但大铁锅与自己一毛钱关系没有——铁匠心想，这么大的铁活，通知我去抡两锤也好啊——就连想象中需要坎土曼（注：当地传统农具）来挖沟的“西气东输”工程也与他们无关，几十台挖土机一个上午就全部挖完了。

在南疆这个名叫阿不旦的小村庄里，人们在轮番的期望和失望里度日，随便找点什么事做就过去一天。老人摆着五个螺丝帽在集市上卖一天，汉子吭哧吭哧刨树根刨一天，周围的人在旁边看着也看了一天。

许多人一起看中挖洞的行当。汉族人张旺才一挖几十年，想要将村外的家连接到村子里；玉素甫雇了好几个人来挖，试图在地里挖出宝贝。还有考古专家在挖，石油工人在挖，矿工在挖，东突分子在挖，新农村建设在挖……各种挖凿者、各种工具在地下彼此倾听，整个村庄处于巨大的凿空之中。

天长地久地想一些小事

刘亮程是久居新疆的汉族人。三十岁前，他住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那里汉人多，尤其会做饭的汉人，刘亮程家也开着饭馆，于是有人传言大盘鸡就是他发明的。“好像这么有名的菜由一个作家发明比较合适，说得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否认，只好说时间太远记不清楚了。”他大笑。

种过地，上过几年初中，当过农机管理员，三十岁后进乌鲁木齐打工，现在新疆作协当专业作家。这个出生于大饥荒时代的汉人在新疆生活了四十多年，沿着父母当年逃荒到乡下的路一点点艰难地返回到城里。

青春期的时候，他怀着满腔浪漫情怀写诗，并打算创作万行长诗描摹自己热爱的村庄。写到几千行，突然没了兴致，转而写小说。小说写了三分之一，赶上出版社想为青年作家出版散文集，他又转头去写散文，原有的小说、诗歌也一并改写成散文。没想到歪打正着，一举成名。

九十年代末，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被文学评论家们誉为“20 世纪最后的文学景观”，到现在仍以每年一万册左右的数量再版印刷。书中描写他生活了多年的小村庄黄沙梁，写他平日在太平无事的地方单纯的生活。

“有时，我会花一晌午工夫，把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土包铲平，或在一片平地上无故地挖一个大坑。我只是不想让一把好锹在我肩上白白生锈。”

在没有大事发生的地方，一件小事可以被想成大事。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这一生中，我最应该把那条老死窝中的黑狗称师傅。将那只爱藏蛋的母鸡叫老师。它们教给我的，到现在我才用了十分之一。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出生，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一切道理……

“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

给声音世界一个现实出口

问：最早要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农村生活的什么部分打动了你？

刘亮程：声音吧。整个这本书就是从声音开端，也是以声音结束。我生活在北疆，对南疆的声音充满好奇。驴车行进在乡村的路上，一万头毛驴汇聚到大巴扎上，满街的叫卖声、毛驴的叫声、叮叮当当铁匠铺的敲打声，还有你听不懂的语言，对我来说构成了新鲜的世界。

我对声音特别敏感，写《一个人的村庄》时就对乡村的很多声音感兴趣。我经常写到的一个自然意象就是风，因为风中各种事物都有声音，整个你要描述的世界都被风带动。我曾经勾画这样一个闲人，他基本上都在风中活动，到哪儿去都喜欢顺着风走，刮南风的时候他就朝北走，走到某个地方停住，等另一场北风刮起的时候再朝南走，从来不顶着风，反正没事干嘛。他到谁家去，也不动手，背着手等风把门刮开再进去，进去后风又很快把门关上了。

那时候我的听觉非常之好，要刮风的时候就感到风在远处已经形成阵势，树梢开始晃动，树叶沙沙有声音。风的前卫已经到了，但是更大的风还在后面。你从风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它经过了哪些地方，经过高山还是树林，荒野还是沙漠，每一处地方声音都是不同的。通过这些声音你感知到遥远大地上的山河之形。这就是我在一个小村庄里听到的世界的声音。

我本来就是想构筑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完整的声音世界，但是写着写着这个声音世界跟现实发生关系了。西部开发到了，这个村庄原有的声音面临着被现代工业声音的冲击。摩托车、大卡车进入村庄，不断带来新的声音，原有的声音也在抵抗。

问：为什么要跟现实发生关系？

刘亮程：它就像挖洞一样，挖着挖着肯定要有一个出口。假如这个洞不触及现实，一直挖下去，就越挖越虚无。

比如张旺才挖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要挖到哪儿去，他就是想挖一个洞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精力耗费掉，挖的过程中他找到一个目标，要挖到村子里去。这也是我找到目标的过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或者是为自己这样的一生找到一个借口，让平淡的生活变得不再平淡。一亩地，今年收两麻袋麦子，明年还是两麻袋麦子，后年还是不会多。年复一年，孩子长大了，自己老了，毛驴下了几个驴娃子卖掉了，什么东西都不会增加，只有自己在衰老。这样的生活怎么过？

正常的生活应该给人以希望，哪怕今年和明年一模一样，也应该给大家一个更远的期望，也许十年之后会不一样。乡村生活看不到希望，看到的倒是个人生命年不如年。但是农民在这种生活中，活出了自己的哲学和生活经验，把贫困的日子可以有滋有味过下去。

问：但写现实不免涉及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这些方面会不会难以处理？

刘亮程：这肯定需要绕着走。这么多年在新疆写作，早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写，什么东西不能写，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度，不让碰不能碰的，自然就不去碰。在新疆写作或者写新疆题材敏感区很多，有些的确是敏感的，比如宗教，我们要尊重。有

些敏感区是我们自己划定的，也许本来不敏感，我们让它敏感起来了。有些就很可笑了，我们《新疆日报》汉文版，从来不刊登猪的照片，从来不在标题中出现猪字，养猪成绩再大都不能上报纸的，说是尊重信仰伊斯兰教的读者。尊重应该是平等的。我们首先要尊重自己，其次是相互尊重。养猪和有关猪的报道，都是生活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我们无中生有把它宗教化。当然，这些话都是不能说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说就不交流，都搁在心里，说能说的话，说好听的话，说假话，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可能需要大家靠面子上的好听话和假话维持长久的。

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是一场最大的改变

问：你对南疆的兴趣和了解开始于什么时候？

刘亮程：我三十岁前都在北疆生活，之后到乌鲁木齐打工，有机会去南疆了。我觉得南疆许多小城镇的人们都非常善良。第一次去库车时，县上一个退休干部给我做翻译，带着我去做采访。后来我就不让他去了，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小巷子里转，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见到那些维吾尔人打个招呼，身上带着一包烟，蹲在他们身边一人递一支烟，他抽我也抽。望着他笑笑，他也望着你笑笑，后来就觉得我能够看懂他们，不需要翻译。这种生活就像我的父辈过了多少年的生活，就像跟我的老父亲坐在一块，完全不用再说什么了。

库车麻扎（注：墓地）旁边有个木头市场，经常有些老人坐在那里乞讨，前面铺一个手帕，用土块把四角压着。每当有人放钱，他们就会念一句经，祝福一下你。我那时坐在他们中间，穿一件旧衣服，头发很长，风吹着，肯定很落魄的样子。一次一个维吾尔族中年妇女过来，也给了我五毛钱，我就赶快接过来说谢谢。那些老头也觉得没什么，觉得是应该的。

问：阿不旦村里只有一家汉族人，在村里受到少数民族政策对待，相处很融洽。这部分反映的是现实状况还是属于小说创作？

刘亮程：算是很温和的一种小说描写。早年南疆很多村庄都有汉族人，好像是政府为了民族团结或者民族融合搭配进去的，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对的，汉族人可以带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到少数民族村庄，那些从内地逃荒来的汉族人，确实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影响了当地的种植业。北疆的许多汉族村庄也有哈萨克或蒙古牧民，到现在都相处的很好。南疆少数民族村庄到九十年代初还有汉人生活，后来基本上都自己迁出来了。现在南疆的村庄里基本是清一色的维吾尔族。我在小说里写的张旺才，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落户阿不旦村的，在村里生儿育女，孩子已经是地道的阿不旦村人。我是希望这种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采访了一个南疆维吾尔族和汉族结合的家庭，老人是内地知青，娶了维吾尔族老婆，生了几个孩子，都长大了。以前生活都很好，但这些孩子被东突分子动员，要把汉族老父亲杀了，他们的母亲非常痛苦，每天都担心丈夫的生命，两个女儿很爱父亲，每天就保护父亲。这一家人的故事就足够写一部小说。南疆东突的状况非常严重，因为村一级是难以掌控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许白天下去检查的时候好好的，但是晚上他们说的啥干的啥都不知道。

问：据你对南疆的了解，当地人大多是一种什么想法？

刘亮程：我个人感觉，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新疆老百姓的国家意识很浓，对政府、对党都非常拥护，九十年代到现在，新疆的城市在发展，贫富差别在加剧。这种差异更多让老百姓看到眼里，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对抗，再加上东突分子的煽动，民怨很大。我们现在只能靠非常强硬的手段去压，这头压下去那头又起来，短期内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新疆这些年一直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可以不发展经济，不顾及民生，这是失策的。到头来稳定还是出了问题。经济落后，许多农村的贫穷问题没解决，本来就有民怨，再加上东突分子鼓动，加上民族情结，就更加复杂和严重。东突分子一直把新疆独立作为千年的民族梦想，任何行为都是朝这个愿望努力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问：那么汉族人在南疆会受到严重的区别对待吗？

刘亮程：在中国有两个少数民族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个是藏族，一个是维吾尔族。藏族是信仰佛教的，它的文化跟我们是同一个体系，有宗教认同，我觉得问题还不是太大。但维吾尔族的宗教是伊斯兰体系，本身就缺乏宗教认同。我们几千年来对西域民族的统治也是反反复复，中央政权强盛的时候它是归顺的，中央政权一旦出现问题它马上独立，一直是若即若离的状态。汉代唐代对西域的统治非常好，因为国家强大，后来到了宋代、明代，这地方几乎就无力顾及了，到了清代又收回来，正式纳入管辖版图。从解放到现在，是新疆历史上非常可贵的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在西域历史上战乱不断，这么长时间的安宁是很难得的。

其实新疆佛教历史比伊斯兰教历史更长，从魏晋时期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左右都信奉佛教，比如龟兹、和田都是有名的佛国。后来伊斯兰靠武力征服了这个地区，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整个西域无暇顾及，放弃给阿拉伯世界。新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化就是那个时代开始的。

问：你在作品里提到，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是新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变。

刘亮程：因为这是人心的改变。我们中华文化朝西南、东南扩展都是成功的，那里的少数民族完全接受了儒教，许多已经被汉化了，但是朝西北方向不成功。汉唐以来我们也把儒家文化带向西域，在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中就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这里离中央政权太远，往往带过来的只是军队，没有及时把文化带来。更强势的伊斯兰文化进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办法改变这个地方的人心现状，能改变的只是生活了。

在新疆，我的感觉是，年轻人相对宗教意识比较淡，吃喝玩乐无所顾忌，一旦到了四五十岁马上回归，变得判若两人。他开始为自己的精神活着。比如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也有，但离婚率非常高，年轻的时候因为相爱就结婚了，但四五十岁之后基本上都会离婚。因为他会马上想到，自己死了之后是要进麻扎的，不信伊斯兰教的只能进墓地，埋不到一块。一个要进天堂，另一个去不了，必然要分手。

过于简单的城镇化模式

问：面对村庄被凿空的事实你是什么心情？

刘亮程：我心情很平静。凡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祖先都告诉我们要平静接受。慌乱也没用。乡村生活就是这样。

问：可你怎么看乡村会被现代化吞没的趋势？

刘亮程：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其实就是城镇化，我们改造乡村只有这样一种模式，太单一。以城市为模式改造乡村是不适合的。乡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类的第一家园，是我们祖先经过多少代过习惯、过成熟的一种生活，是上帝给我们的家园。我们现在试图用人类第二家园城市的模式来改造第一家园，想法自然不对。

城市生活过于简单，它不考虑人的环境、心灵、幸福感，只考虑人是否富裕。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农村改造就是给农民盖两层楼，可农民除了自己的一亩二分地，还有自己的家庭小院，里面种点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或者两只羊，一年除土地之外的收入基本就都有了。你看他们人均收入一年几百块，都不可想象他怎么生活。他活下来就靠他的小院子。住上水泥房子之后羊往哪里养，鸡往哪里养？我们的新农村设计者，只考虑的是电视机放哪儿、沙发放哪儿，都是城市人的想法。还有些地方搞新农村建设，不让农民种果树，房前屋后都是风景树，菜园里不让种菜，全养花，多荒唐。

这是物质方面，文化方面我们也不考虑。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截然不同，比如我们甘肃老家，家家户户进门都有照壁，之后是正堂，然后两厢分开。家中大人孩子住哪边都有规矩，逢年过节敬献祖先，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家里既有宗教又有现实。这样的环境就是一个小社会，生活是连天接地的，家里长幼有序，儒家文化在管理这个院子。新农村建设不考虑这个，水泥房子里什么都有，但是祖宗灵位没有了，堂屋没有了，这种文化为什么不能考虑？文化建设就是刷标语吗？“住上抗震房，感谢共产党”？我们搞新农村建设，在文化上准备不充分，资金方面也是不充分，都是匆匆忙忙在搞。

问：所以你对乡村城镇化持一种悲观态度吗？

刘亮程：不是，我觉得完全可以做的更好。乡村肯定是需要改善的，就新疆来说，移民最早到新疆的都是挖地窝子，六七十年代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后来稍好一点住土块房、砖房，但即便如此农民居住条件还是很差。新农村建设说白了就是给十亿中国人民盖个新房子，但是你不能让农民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上个月刚从陕西延安地区回来，那里比如吴起县、志丹县，也是通过开采石油赚了一些钱。但这些钱我看也基本花在了县上，大楼盖了一幢又一幢，空空荡荡的，吴起县光建红军长征广场就花了两个亿。我走访了一户从窑洞搬到新农村砖房的人家。当地的政策是每间新房政府补贴五千块，这户人家盖了四间房，拿了两万块补贴，但盖房子总共花了十几万，还借钱。这个新农村之家是靠政府掏了一点钱，农民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加欠债共同建起来的。农民眼睛小，一看国家要给补钱，不要白不要，然后就不舍成本把自己老家底全部搭上，以后的生活在哪儿？不知道。这让农民陷入了二度贫穷。

问：你如此热爱乡村，为什么还能忍受在城市生活？

刘亮程：乡村适合像我这样有乡村情结的人，是心灵寄托的地方。但乡村已经变成这样了，可能更适合我们在城市中怀想它、追忆它，在梦中一遍遍的回去，醒来再在城市里谋生。城市太适合人的身体生活了，交通、住宅、各种物质配送，非常便利。乡村也许越来越不适应人的身体生活。

问：乡村人也希望更舒适的身体生活啊，城镇化未必是错误的方向。

刘亮程：我并不是排斥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可以移植一些让人身体舒服的因素到乡村庭院里，但是不能把它珍贵的东西全部扔掉。可以改造乡村，但不能取代乡村，这是两个思路。现在乡村的下水道、自来水、煤气，都可以一步步改造。但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要保有。我们光说传承文化，文化是最细节的东西，你把某一个细节给它扔掉，跟它相连的文化链条就断了。比如祭拜祖先，可能在家里就占一个墙角，这是占地方最小的一个东西了，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

关于新疆发展的“刘七条”

问：怎么看待现在国家要建设喀什经济特区，对新疆的大力建设？

刘亮程：这是个伟大的决策，十年前就应该做了。当国家把目光和精力集中到新疆的时候，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又回到汉唐时期，和祖先想到了一起，甚至面对的困难和机遇都那么相似——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首先要经营好的是西域。我们在东南沿海已经发展这么多年，取得令世界震惊的成就，现在却不得不回过头来让新疆崛起。这是必须的抉择。因为我们的作为和出路依然在西域。到现在我们的主要能源通道依然是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指引的方向。这是历史的重合。

新疆工作会议开之前，中央下来一个调查组，我还一直想着会不会找到我，哈哈。我们在新疆这么多年，能够切身处地为政府也为新疆民众着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找我。不过我在私下场合讲过关于新疆建设的七点提议，跟朋友开玩笑说叫做“刘七条”。

问：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亮程：第一条，让南疆人民免费烧气。新疆是中国的资源大区，没有新疆的资源就没有中国的二十一世纪，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资源所在的南疆地区，人民生活依然贫穷。我们的石油开发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也是利润最高的时候，是有能力让南疆人民免费烧到天然气的。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好处，第一是让资源大区的人们享受到资源带来的福利；第二是南疆地区农民普遍穷困，烧不起煤，到现在主要的燃料还是砍伐树木，免费烧气肯定对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是很好的保护。

第二是让北疆人民免费烧煤。北疆是中国主要煤产地，也存在与南疆一样的问题。

第三是南疆地区“还地于农”。南疆许多地方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地。新疆的地只能种一茬，一亩地种麦子如果种好了，打上两三麻袋，刚刚够吃。如果种不好，口粮都不够。

另一个情况是，这二三十年来，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两岸大片土地被老板从县上买去开发种棉花。这些老板根本不必靠棉花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就是为了在土地上捞更多的利润，但却占有了农民养生糊口的唯一资源。而且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让地下水位下降很快，很多地方已经找不到淡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政府穷的时候，比如二十年前，可以卖点地补贴财政，但现在国家投入力度这么大，完全有能力把开发的地收回来还给农民。如果南疆人民人均能拥有五亩地，除了种粮食之外能种一点经济作物，马上能过上很好的生活。这几年政府在农村做了大量工作，花了很多钱和精力，都是折腾农民这一亩地。今天号召种果树，明天鼓励种棉花，把土地折腾得疲惫不堪，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还地于农是让农民致富最简单的办法。

第四是北疆“还草于牧”。北疆这些年也是大片的草场和荒地被政府卖给老板开发，导致和南疆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第五条，在新疆推行平等的民族政策。现在有些政策少数民族享受，但汉族享受不到。其实在新疆汉族也是少数民族，相对数量也比较少。这种差异是在制造一种人为的分歧。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汉族人只能生一个，少数民族一般工作人员可以生两个，农民就基本没有限制。我希望新疆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六是让全疆各族人民享受同等的宗教政策。三十年来新疆发展最快的就是宗教，现在清真寺的数量是两万个，跟学校数量一样多，阿訇的数量是四万个，跟教师一样多。 以前一个村最多一个清真寺，现在每个村都有两三个。我们成了世界上清真寺最密集的地区，包括阿拉伯世界都无法相比。但是另一方面，佛教和其它宗教受到了限制，我们现在对佛教的政策是，只能在原有佛寺基础上建设，新建寺庙基本都不能批。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应该寻求各宗教间的平衡与和谐，应该有一种大胸怀。

第七条，在新疆少讲民族，多讲国家。翻看新疆报纸或者打开电视，全部在讲民族，什么“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绕来绕去，就是少讲一个最关键的：无论哪个民族都离不开国家。在新疆这样一个地方最应该淡化民族意识强调国家意识。国家为上。

问：跟官员在私下场合讲过你的“刘七条”吗？

刘亮程：讲过啊，但我们和官员的想法和目的不一样。我们是想把事情做得越简单越好，直接让农民脱贫，官员总想着把很多钱花了，做好多项目，间接让农民脱贫。

我们想着国家现在有三千亿要花在新疆，那先给新疆人民分钱啊，这不是最简单的致富方法吗？给每家发两千块钱，至少那些贫困农民就可以过富裕的一年了。但这样肯定不行。今年花完了明年咋办？政府的考虑是用这些钱做项目，大钱做大项目，小钱做小项目。问题是钱都做项目了，农民到最后还是没见到钱。我说还地于民、还草于牧，这对政府来讲是最简单的事情，只要拿出钱来把地买回来还给农牧民就可以了。这样简单的事情政府肯定不会去做。太简单了，出效益不出政绩。不管怎么说，这么多钱来了，对新疆人民未来的生活，肯定有很大的改善。但我也担心，这么多的钱，如果用不好，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环境灾难。多少山会被挖空，多少土地被毁坏，多少河流污染。当然，政府会做好这些的，文人多操心。

问：你期待通过写作来达到什么功用吗？

刘亮程：没有，我没有这么大的志愿。所有写作可能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写作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我也不想把我的作品引向狭隘的方向，不希望它的一些主题被误解。我对新疆充满了感恩，新疆是我的父辈的逃荒移民地，却是我的出生地和家乡。我一直在用心感受这个地方。《凿空》是我“一个人的新疆”，不能代表全部的新疆。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部跟真实新疆有关的小说，让读者了解在异域风光风情和欢宴歌舞之外，还有平常人家多年不变的生活。

我们常常一讲到民族就充满猎奇心理，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一些风俗和宗教信仰，我们都是人，都一样生活在一个地方，享受着一样的阳光和风雨，都有一样的梦想，一样在贫困或者富裕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不旦跟中国任何一个村庄的人都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名字。

问：嗯，最后一个话题，作为读者我很喜欢“拖拉机”一章，里面写到驴、狗、羊对于拖拉机的不同想法，非常精彩。你经常会考虑动物们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吗？

刘亮程：我觉得我可以站在任何一种动物的角度想象一件事情，没有任何隔阂。一件事我可以想很久，我用驴的脑子也可以把这个世界想清楚，用羊的也可以。

《凿空》开始构思时，村里的动物是主人公，本来在南疆村庄，动物的数量就比人多，每家有一两头驴，几只羊，还有鸡。村庄的声音世界始终被动物掌控。驴鸣盖过一切，即使后来拖拉机汽车石油大卡车进来，它们的声音都没法跟驴鸣相比，阿不旦的毛驴有一个习惯：听不得比它大的声音。每当一个外来声音进入，驴就叫着跟它比高低。

还有狗，它也耳闻目睹见证了村庄的变化。它能做到的就是一成不变。因为再变它也变不成人。安心做狗。村里的狗白天四处觅食，给人看门，受人打骂。晚上人睡着后村庄成了狗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夜晚的狗坐在草垛或土堆上，后腿卧地，前腿立起，腰挺直，嘴朝上，眼睛望着高远处，汪汪地叫。这时它从白天的低下生活中脱身而出，它的叫声不再为一口狗食，为一点动静，那是一种纯粹的叫，对着我们不知道的茫茫夜空。

我本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后来因为结构考虑，删掉很多，变成现在的模样。不过，剩下的应该是最好的。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網易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